

新世紀

書院研究
部藏書印

半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論壇

民國廿九年的展望
日美間的談判
日法將訂越南不侵犯條約

專載

論東亞新秩序……………力 菴
歐戰與中國……………張祖望
泛論蘇芬糾紛問題……………呂純臣
中國歷代紙幣史述略……………汪切膚

譯著

論中國問題……………日本評論
日美通商問題……………竹內謙二
日美商約問題……………A. W. Gaisword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續)……………J. W. Wheeler-Henrett
第四章 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

國立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CHINA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



論

壇

我們想對中國人，在今年的新年，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就是今年大家都能再戰下，無非是兩敗俱傷，和起來就可以再戰，所以今年正充滿了新復之機。

我們想對中國人，在今年的新年，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就是今年大家都能再戰下，無非是兩敗俱傷，和起來就可以再戰，所以今年正充滿了新復之機。

一、想請在上一期社論中日相近衛發表宣言，接着汪先生發表電報，如果在那時重慶方面即進行和議，去年中我們早就可以過太平日子了。然而這個大好時機，就那樣的輕輕放過。要說是日本條件太苛刻的話，那們近衛宣言，不過是大綱，而大綱的內容是不賠款割地，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至少這幾條大綱，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亡國條件，即說是日本所提的大綱表面甚好，但是詳細條件就會十分苛刻，不過不與之交涉，如何可以斷定苛刻？答應苛刻條件，固有亡國的危險，但是進行和議怎會有亡國的危險呢？要說是我們有最後勝利的把握，所以不與日媾和。但是在去年一年中，軍事差不多在停頓狀態之下，我們又失去了南昌，海南島，福建沿海各口，最近南寧又失去了，然而較爲有名的城市，我們却一處未曾克復過。現在軍火財源都已瀕絕境，這還有什麼勝利的把握？要說是國際方面有幫助，則去年一年中的事實，早把這個假設打破無餘。中國所恃賴的是英美法蘇四國，現在英法是自顧不暇，蘇聯是變成一個侵略國家，現在早已把爪哇擁着中國西部，只不過等一個時機來吞噬，美國對日雖有種種警告，但是作用也無非是保持它在華的權益而已。所以在當時進行和議，中國失地尚不如此之廣，法幣價值也未暴跌，加之國際上的聲勢還有一點，地位也好得多，事體簡單得多，而且戰事在歐戰前結束，對中日都有莫大的利益，可是這個機會就輕輕的丟了。

從客觀上觀察，中日兩國都有從速結束戰事的必要和企望，但是在中國方面，既成局面因爲特殊環境關係，只能拖下去到拖完爲止，却無法與日本進行和議打開一個新局面。在這種情形之下，事態是異常複雜困難，現在的和平運動就是從這種事態下產生的，所以它的過程是不容易的，因爲在民衆的熱烈情緒之下，討論和平已經不易，何況是發起和平運動？和平運動下，沒有地盤，又沒有軍隊，有什麼力量來應付重慶的壓迫？又有什麼地位來和日本談判呢？這實在是一個最嚴重的焦慮，然而在去年一年中，和平運動已經有了眉目。第一，民衆方面已有了深切了解，知道最後勝利是絕無把握，知道講和至少決不是亡國，並知道再拖下去是更糟，所以民衆希望和平，不怕和，而且想和得快。第二，日本方面如果對於和平運動，只不過想利用它來消滅重慶或是滅亡中國，那們和平運動就會轉瞬消滅。但是就實際情形看來，日本是只想和平運動來結束戰事，並且想從這個運動的基礎，奠定東亞永久的和平。

和平運動既然得了民衆的擁護，而對於和平的條件也有了把握，爲實現和平起見，組織中央政府當然是不可避免的步驟，據我們看來，組織中央政府雖會和重慶政府對立，但決不是拆重慶的台。現在日本有許多軍隊在華作戰，未曾把重慶政府消滅，要說是和平運動裏這幾個人就會把重慶消滅，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但重慶政府會長久支持下去嗎？我們認爲這又是不可可能的，因爲中央政府成立後，逐漸把和平條件履行，例如日本軍隊逐漸撤退，由中央軍隊接防，這樣一來，抗戰的對象就已經消失，同時共產勢力的壓迫，却日甚一日，在這種情形之下，重慶政府的官員和軍隊，自然而然的會同中央合併在一起，這根本談不到什麼拆台不拆台。

和平運動的起點是極艱難遲緩的，但是一上了軌道之後，就會日進千里。在去年一年中，和平運動本身進步，不能算什麼，但是四週一切

的條件都湊合起來，好像一部火車的機件都配合起來似的，只待今年開車了。所以我們對於今年，可以抱着很大的期望。

日美間的談判

最近日美間的談判，引起了全世界的注視。談判的當事人日美兩國不必說了，此外最注意的是中國，其他如英法等國也相當注意，日本的希望，在對美作相當進步後，美國可以保持原來商約的本質，使日本對美貿易上不致受打擊。美國的希望，在利用商約的關係，使日本對於美國在華的權益，不得不相當尊重，從這兩點看來，日美談判成功與否，其關鍵在日本對於美國在華權益，是否願意尊重而已。所以日美間的問題，並不是根本沒有調和餘地的。中國的希望，是去年七月間美國聲明廢止日美商約後，美國即拒絕與日談判，俟今年一月到期後，美國即對日實施經濟制裁。現在日美間已舉行談判，在談判之前，日本表示開放長江下游，美國方面則表示在舊約期滿後仍得適用一般稅則。這樣一來，中國最後所希望的國際援助，又打消了。英法等國在華也有特殊權益，但是他們無法和日本爭執，所以他們希望美國出來和日本交涉，等到結果後，跟着把他們的權益維持下去。英法方面的非正式表示，對於日本宣告準備開放長江下游，無不表示欣慰，但認為須早日實行及航線放長罷了。

在去年美國宣告廢約的時候，本刊就指出美的目的，在維持它在華權益，並不是保全中國的領土主權，可是國人中頗有萬一之想，希望日美間真的會弄僵，使美國實施經濟制裁。殊不知美國對無約的國家，並不是完全中止貿易，不過課以值百抽十的附加稅罷了。我們即假設美國真個實行制裁，完全停止對日貿易，日本固然感覺困難，但是中國能因此獲得最後勝利嗎？我們再假設真能因此制住日本，那門日本尊重美國在華權益，不就了事嗎？

自從歐戰發生之後，中國對於英法的援助，早已絕望，對於蘇聯這樣狠辣，嘴邊雖然還說不關事，但是心裏却着實害怕，所以把一切希望

都放在日國身上，可是現在日美也妥協了。也許有人對於日本的讓步，表示欣欣然，然而日本所讓步的，是日本的權利？還是中國的權利？我們的抗戰是爲中國呢？還是爲外國在華的權益？中國居然有人高唱我們的抗戰是維持外國在華的權益，是的，抗戰的結果，確使日本不得不相尊重外國在華的權益，但是這在中國未免太慢了罷！

日法將訂越南不侵犯條約

據香港電訊，日法解決公債爭議後，雙方深表滿意，近復談判新商約與越南不侵犯條約，現雙方均已贊同，並成立草案，所以中越邊界的日軍，退出所佔領的龍州，與鎮南關，又聞雙方已決定於今春正式簽字云云。

此次抗戰中，國人表現一種奇特的心理。自己的重要城市失去，都滿不在乎，但是只要該城市和外國在華的租界屬地或是商業有關，中國人反表示嚴重的關切。這種奇特的心理，實不能不歸咎於盲目的宣傳。例如上海陷落，都說是毫無關係，反替英法租界擔憂。首都陷落，也說不要緊，反替英國的長江航運擔憂。廣州陷落，也說不要緊，反替香港擔憂。海南島陷落，也說不要緊，反替英法屬地擔憂。現在南寧陷落，也說不要緊，但又替法屬越南擔憂了。

有人說，中國並不是真的替外國擔憂，不過藉此提醒他們，促他們援華制日罷了。然而運用這種手段，卻未免太幼稚可笑了。各國的當局，難道對於他們的權益，如此漠視，如此糊塗，必待中國來提醒嗎？他們會相信中國把日軍轟出去後，中國對於他們在華的種種特權，還會尊重嗎？老實說：他們所希望的是日本不要全勝，中國不要全敗，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在華的權益才能保存，他們的租界屬地才能安全。

此次日本答應不侵犯越南，還在作戰中的法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安慰，法國將怎樣回報日本哩？這就值得我們深思了。如果我們看法國應日要求，禁止滇越鐵路運輸軍火，就可以恍然了。

專

載

論東亞新秩序

力菴

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一個口號是日本在戰事發生後提出來的。在中國一般人聽起來，這無疑是日本要滅亡中國的一個新名詞，所以一聽到就覺得頭痛。但是東亞新秩序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探詢日方的意見，或是從他們的刊物去研究，也是同樣的摸不着頭腦。這一來，就愈覺得這個口號有些古怪，愈覺得可怕了。假使我們不相信唐借念緊箍咒咒使得孫行者頭痛這一會事，我們正不必認爲一提到東亞新秩序這一個名詞，真的怕會頭痛，而必須來詳細的研究一下。

所謂東亞新秩序，當然對東亞舊秩序而言。這個舊秩序是怎樣一回事？有沒有絕對保存的必要？如果舊秩序是好的，我們當然用不着新秩序，反之，則新秩序至少有考慮的必要。我們都知道，總理有一句名言，說是：「中國不是處於半殖民地地位而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至於日本則是世界第一等的強國，所以東亞舊秩序，是一個一等強國和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配合着，同時夾着歐美國家的勢力綜合而成。歐美國家不讓日本獨吞中國，同時日本也不讓歐美國家來瓜分中國，而歐美國家間分配也不能安當，於是中國在這均勢下苟延性命，也就是在這舊秩序中活着。

這個舊秩序的建設，係自鴉片之戰開始，到了九國公約的成立才確定了它的形式，其間經過了八十年的時間。在這個建設舊秩序時間的初期，完全是一個亂秩序，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給許多國家侵犯，因此由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降到次殖民地的地位，所幸我們的主權和領土還未剝削淨盡罷了。關於領土的損失，大致可分爲三種方式，一係直被

了當的割讓，如香港，安南，台灣等地。二係租借地，如九龍，廣州灣等地。三係租界，如滬寧等地的租界。關於主權的損失，其最重要的，是外國領事有裁判權，中國的關稅由外國管理等等。除此之外，外國又可在中國駐紮軍隊，內河可以航行等之特殊權利。中國受各國不斷的侵犯，已經快到完全被瓜分的地步，所幸中國推翻滿清成立民國，國際間耳目一新，接着歐洲又發生戰爭，歐洲國家無法東顧，雖然日本頗想乘此時機取得亞洲大陸的霸權，但爲美國所阻，一時東亞舊秩序呈搖擺不定的現象。歐戰終了後，英法的勢力在遠東又恢復起來，至於德奧則因戰敗，在遠東的勢力完全消失，俄意兩國因內亂關係，一時也向遠東退縮，比荷葡等國因依附英法，所以他們在遠東的勢力仍舊保持。日本在東亞的發言權增加了，但是美國的發言權卻更增加了。東亞舊秩序已從搖擺不定的狀態下，必須達到安定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頗易引起激烈的變化，於是各國間集議，如何確定東亞舊秩序，藉以避免列強間的戰爭，這就是召集華盛頓會議的主要目的。

按照華盛頓會議的當時情形，英美法三國在遠東方面會引起衝突的可能性，可算是沒有，至於其他與會的國家，如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及葡萄牙，更是不必談起，不與會的國家但是與遠東有密切關係的是蘇聯，但是在當時情形之下，蘇聯內亂方殷，根本沒有向遠東發展的力量，而且當時各國都沒有承認蘇聯政府，所以置之不理。算來算去，只有一個日本，會向亞洲大陸進展，足以引起各國間的衝突，因此英美兩國聯合共同應付日本，迫使承認海軍力量之比率爲五五三，就是英美各五

而日本爲三。這樣一來，英美認爲日本將來決不能輕易妨害他們在華的權益了。於此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華盛頓會議只討論到海軍比率，卻未提起陸軍問題。但是中國所畏懼的，不是日本海軍，卻是日本的陸軍，因爲惟有陸軍才能嚴重侵犯中國的獨立，但是華盛頓會議中並不提起，於此可見華盛頓會議的整個精神，係避免列強間的衝突，或者更露骨的說，就是防止日本的突進，而決不在替中國設想。

日本是一個自傲的國家，對於海軍的限制，雖然在當時情形之下，不得不暫時忍受，但是自然認爲一種侮辱，只不過等待時機來推翻罷了。至於該會議中所成就的九國公約，規定各國機會均等，這在中日兩國都不能滿意。就中國方面而言，中國給與他國的權益，原要看對方給與我國的權益如何，及一切政治經濟情形而定，那能使各國機會均等。當時中國承認各國在華機會均等，這就表示中國已經喪失了一部分自由。不過在當時情形之下，中國唯恐變成列強逐鹿之場，既然各國答應機會均等，已經頗有喜出望外的感覺了。就日本方面而言，它一向希望在中國取得獨多的利益，現在機會均等，不但日本和英美法等國一樣，甚至葡萄牙這一個小國的地位相同，日本如何肯甘心呢？所以日本處心積慮，希望整個推翻華盛頓會議。換一句話說，日本在準備推翻那個東亞舊秩序。

我們中國對於這個東亞舊秩序的確定，作何感想呢？孫總理當時表示不承認九國公約有效，而現在重慶卻把該約奉爲金科玉律，換一句話說，就是總理不承認忍受那個東亞舊秩序，而現在的重慶政府卻堅持這個秩序，那們這個由九國公約確定的東亞舊秩序，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呢？在各國方面，它們協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的完整，這種尊重本係國際間所應有的，但是那時視爲各國對中國的一種恩惠。恩惠當然得報答，於是中國承認門口開放機會均等，這顯然是已經侵犯了中國主權，還談什麼尊重呢！該約中所稱尊重中國主權一節，不過是各國間的一個協定，並沒有保證辦法，如果當時訂約即有保證辦法，將來是否能實施，還是問題，而中國卻早已簽了門戶開放和機會

均等的義務。簡言之，就是列強把一句空話，使得中國失去了一部分自由，這就是總理當年所以提出異議的理由。

與九國公約有聯帶關係的有幾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各國聲明準備放棄領事裁判權（二）各國聲明準備撤退駐華軍隊，這都是不註支付日期的支票。關於關稅問題，則訂有「九國關於中國關稅稅則之條約」。該約的成立，否認中國有關稅的自主權，所以稅率的增加須獲得各國的同意，但是該約使當時北京政府獲得值百抽二，五的附加稅，所以當年的北京政府對於該約是頗爲感覺滿意的。

現在重慶政府認爲九國公約的目的是保證中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又認爲九國公約是中國的權利，殊不知該約的目的，係避免列強間的衝突，所謂尊重中國主權不過是一個手段，況且只說是尊重，根本並未加以保證。至於九國公約，是中國一種義務，並非權利這是更顯明的事實。如果我們說重慶不明瞭這一層道理，似乎難以置信，不過在事實上，重慶是把九國公約崇拜得和金科玉律一樣。我們如果把當年國民黨和北京政府的立場比較一下，再把現在重慶的立場來比較，我們會發生一個什麼感想呢？

從上所述，我們對於華盛頓會議所確定的東亞舊秩序，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對中國是迫使處於半殖民地地位，如果說得不好聽些，就是常處於次殖民地，讓列強來共同支配。對日本是迫使其機會和其他各國相等，不讓其侵犯它們在華的既得權益，如是而已。

這個東亞舊秩序建設之後，第一個推翻的不是別國，就是我們中國。在北伐時期中，打倒帝國主義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一片呼聲，推的是什麼？這就是推翻東亞舊秩序，不過當時沒有「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現在由日本人提出來，中國人聽見就未免刺耳罷了。其實當時北伐，未曾用「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一個口號，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失策。孫總理曾經說過「中國的強盛必須得到日本諒解」的一句話，如果我們說「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就有辦法獲得日本的諒解，可是當時高喊打倒帝國主義，這自然把日本也連同打倒在內，這就無法獲得日本諒解。

而中國達到極盛境域的途中，就不免遭遇極嚴重的阻礙了，現在領事裁判權還沒有取消，關稅也未能完全自主，外國軍隊依然在地，並且山河破碎到如此地步，中國推翻舊秩序的努力，至少在目前是失敗了。

第二個實際推翻舊秩序的是日本，但是它們的手法也犯了錯誤。它未曾利用它優越的地位來幫助中國共同推翻舊秩序，卻替列強担當維持舊秩序的罪名，並且使得中國人有一種普遍的印像，就是舊秩序固然不好，但是日本來建設的新秩序卻更不好了。日本以戰前的口號是「消滅抗日」，也沒有提起「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一句話。日本所採取的辦法，不是「釜底抽薪」，而是「火上加油」，其結果就造成這次的空前慘劇。日本對華的戰事，要倚賴英美法的貿易和原料維持，這對於各該國，特別是美國就不能不相當的遷就了。現在戰事已經拖了一年半，重慶方面還是說「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其實呢？機會係完全給予第三者。所以日本推翻舊秩序的努力，至少在目前也是失敗了。

中日兩國的失敗，在中國係想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而未會獲得日本的諒解，其結果是變成遷就一切帝國主義，單單對日「抗戰到底」，在日本係想排除歐美在華勢力同時壓迫中國，其結果是兩種都辦不到。現在是兩個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打得頭破血流，讓第三者在那裏哈哈大笑。所幸自從近衛發表聲明，汪先生發表和平建議後，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已打開一條生路，以後又經過了一年的許多艱辛不斷努力，到現在已經達到大道的起點了。這個起點就是平等互惠的合作，並從這種合作獲得兩國的安全和繁榮。

我們目前的問題有兩面：一係如何解決舊秩序，二係如何建設新秩序。

有人說：舊秩序是中日兩國所皆不願意忍受的，現在既然中日兩國可以合作，那麼我們把歐美的人一齊趕出東亞，不就直截了當嗎？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歐美各國在華的權益，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不合法的；有的是互惠的，有的是片面的。合法的互惠的我們當然尊重；不合法的和片面的我們當然用正當的手續去解除，但決無把歐美

的人趕出去之理。

有人問：舊秩序的建設既根據於華盛頓會議，特別是該會議所產生的九國公約，現在我們要推翻舊秩序，然則應否廢棄九國公約？我們的意見是應該廢棄，因為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要各國來協議尊重，這表明該國本身缺乏維護的力量，實在是國家的恥辱，現在經過這次嚴重的試驗，證明中國本身確有維護的力量，同時也證明了各國的協議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所以我們當然要洗刷恥辱，把九國公約廢除。

有人問：九國公約廢除後，中國還保持門戶開放政策嗎？我們的意見是當然保持的，不過這個政策的意義和運用，和從前有所不同。在九國公約下的門戶開放，是中國的義務，現在是變成中國的主權了，因此在運用上也就不同，所以我們可以對甲國開放，對乙國關閉，或是對甲國開得大些，對乙國開得小些，我們都有絕對辦理的權力。從大體上說，我們當然保持門戶開放政策，因為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都是如此的。

有人問：機會均等的原則還應保持嗎？我們認為絕對應該放棄因為各國對中國的待遇厚薄不同，則我自應厚來厚往，薄來薄往，當然無給予任國家以均等機會的理由。舉一例說：中國購買日紗也購買印紗，但是日本購買中國的棉花，而印度亦有棉花賣給中國，我們爲增進中國農民的利益起見，自應課日紗的稅輕於印紗，爲什麼要同樣的課稅呢？再舉一例說：中國有許多僑民在荷屬領地貿易，所以我們對於在華經商的荷人，當然也應給予相等的待遇，至於比國，則中國並無僑民在那裏經商，我們又何必給予比商以特殊的待遇呢？

有人問：舊秩序的表徵，如租界，領事裁判權，關稅的管理，外軍駐華等，有沒有辦法解除呢？我們認爲係可以解除的。日本方面已單獨表示願意取消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我們如果得到日本的諒解，下列各項問題都可以解決的，不過也許要經過相當的時期，才能完全解決。

關於解決舊秩序的途徑，既如上述，我們現在可以討論如何建設新秩序。如果要建設真正的東亞新秩序，我們認爲必須具有左列的三項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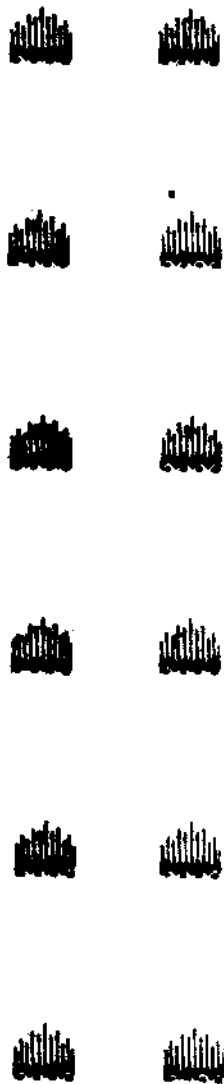
- (一) 中國必須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
- (二) 建設新秩序必須中日共同努力；
- (三) 一切須合乎平等互惠的原則。

以上三項原則的理由是很明顯。如果中國不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那麼中國根本上就沒有建設新秩序的資格。假設建設的工作是由中國一國負擔，以中國如此的貧弱，不庸說就可以明瞭是不可能的。假設建設的工作是由日本一國負擔，那就是造成獨霸東亞的局面。經過這次戰爭，中日兩國都可以明瞭單獨來推翻舊秩序尚且達不到目的，何況是建設新秩序，所以建設新秩序必須中日共同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中日雖然共同努力，然而一切的努力都不合乎平等互惠的原則，也是不能成功的。譬如說，中國單希望把原料賣給日本，但拒絕購買日本的製造品，這就不成了，或是日本單希望把製造品供給中國，但拒絕供用中國的原料，這也是不成的。

關於新秩序的本質問題，在目前戰事還沒有終止之前，本難有具體的辦法，它的輪廓在中日和約簽訂後才能確定，不過我們卻不妨在事前加以討論。新秩序的本質，我們可就政治經濟兩方面來看。就政治上而論，中國將不再為各國逐鹿之場，也不再受各國的任何束縛，而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就經濟上而論，中國不再盡機會均等的義務，而就本

身利害及東亞立場確定對各國的經濟關係。在日本則休戚相關的中國，成爲友國，並不致受他國的播弄，則可以保持東亞和平，而且保持的責任將由兩國分担。至於日本所需要的原料及市場，也可無虞缺乏或失墜。總而言之，所謂東亞新秩序，就是由兩個獨立國家，來共同保持東亞的和平，增進東亞的地位及促進東亞的繁榮而把歐美國家來主宰東亞的現象打破而已。

最後，我們可以說日本現在提倡的東亞「東亞新秩序」，在理論上就是孫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在實際上我們會經努力於「大亞細亞主義」，或是說努力於「東亞新秩序」，也未爲不可，至少我們會經努力推翻舊秩序，所以對於「東亞新秩序」這個名詞，我們正不必感覺頭痛。日本派遣許多兵到中國來，未會把中國滅亡，難道喊這個口號就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會把中國滅亡嗎？總之，「東亞新秩序」這一個名詞的本身，是無可非議的，所以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本質。如果「東亞新秩序」是完全由日本一國建設的，這不庸說，就是日本獨霸中國的代名詞。如果這個新秩序，由中國一國來建設，這不庸說，對於日本當然是不利的。現在兩國單獨建設的工作，都已經失敗了，所以將來要兩國共同努力去建設才行，也只有共同努力的結果，才會有利於雙方



歐戰與中國

張祖望

德國得到蘇聯的所謂「諒解」，達到了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解除了「東顧之憂」的目的之後，所發動的侵略波蘭的行動，逼迫英法兩國捲進戰爭的惡流，動了整個世界的安寧，已是一個國際間最嚴重的問題而無庸再有所疑義。所以，我們姑不問這一幕糾紛的發生是否即為第二次歐洲大戰的前奏，但覺其火線縱橫，戰訊頻傳，雖云屠殺之慘酷，尙未曾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而大戰規模已成，和平之門業已完全關閉，則為確切的事實，不容諱言。然則這種不幸糾紛之層出叠見，尙不僅如此簡單，蓋試觀今日之蘇聯，雖會高揚其所謂「反侵略」的旗幟，高喊其「扶助弱小民族」的口號於一時，但時至今日，已完全暴露其包藏的野心，「趁火打劫」，值此歐洲和平毀於黠武者之手，兵慌馬亂之際，正是蘇聯的良好機會，於是出兵開闢中歐，繼聯德瓜分波蘭之後，進而侵佔芬蘭領土。歐洲形勢的日形危急，則已無法避免，雖云其進展如何，尙有待事實的演變，但此類問題皆非本文範圍，姑不置論，而所欲論者，為歐洲形勢日急，直言之，歐洲戰爭業已爆發，其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如何？或者從這一個問題的檢討中，我們能够充分地認識目前國際間對我國今日的反應，同時，從這一個反應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理解到國家在今日所應走的是那一條路？

在先，我們先要理解中日戰爭發動以來，一切輿論都被統制，所以不論任何問題的討論，都強調着樂觀的口吻固顯是非曲直。在這一種情形之下，對歐戰「給予中國的影響這一問題的宣傳，自然還是「有利無失」，「抗戰必成」這樣的「不二法門」。然而，我們站在愛國者的立場，殊不願人民在有色彩的宣傳中不能確切的認識自身的環境而終作無謂犧牲。所以不論任何問題，我們都不願一切麻煩與困難，作警醒國民而發奮為國的工作。尤其是自歐戰爆發以來，國際情形日形緊急之今日，更不能不仔細檢點國際關係的變化，而為全國人民告。

蘇俄第一次歐洲大戰，對中國的影響，誠然使我們覺得歐州戰爭的爆發，其對中國的影響，不論政治抑或經濟，都在在有利，而無一失。在當時，因為歐戰有利於我們的立場，我們自然樂以接受歐戰的爆發。但目今的一般業經濟統制之中國言論者，亦不稍顧及「時過境遷，今非昔比」的種種情形，而把這一次的歐戰認為「歷史的重演，其有利於中國的作戰是無疑的」。其實這種完全忽略了時代背景與國際環境的謬論，是不值得識者一笑的，但矯正這些歪曲的宣傳，以正人民視聽起見，那是決不容我們袖手旁觀的。

誠然，我們絕對不能否認，第一次歐戰的爆發，非但不會給我們以任何的影響，更因列強當時無暇東顧，國際資本主義加於中國的經濟壓力，因其本身的作戰而撤去之後，中國民間產業乃利用這個列強亟需要戰爭資材，以及海外資金，因歐洲的不安而避難來華的絕好機會，大事活躍。結果，各業飛騰，這一場在西方的屠殺却奠定了中國近代產業的基礎。故第一次歐戰的發動，我們非但不會損失，竟促成而為我國近代產業史中，不可消滅的民族產業拾頭的契機之頁。我們觀察當時促成中國民族產業拾頭的重要條件，有如下三種情形。

(一) 第一次歐戰爆發之後，各國產業均因戰事的激烈進行，大量地破壞着，但為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則在另一方面而極力提倡各國軍需工業原料的需要量。中國在當時固然也算是參戰國的一份子，但是實際上并不會「實際工作」，故在歐洲各國軍需工業原料急切需要的條件之下，中國以原料國姿態出現在遠東，便趁着這一個機會，極力的向外發展。同時，為供給這種向外發展的需要，中國民族產業雖在極度的幼稚中，也茁出了蒸蒸日上之嫩芽，更發揚光大而成為當時中國產業大活動的條件。

(二) 歐洲既因戰爭的爆發而形成狂風疾雨的世界，那麼歐洲資金

便有三黃金必向無風帶流去」的經濟流動原則之下，倘無戰爭的困難裏，作爲當時的「避難」。但是，當時整個歐洲都被捲進了戰爭的狂瀾，任何一個國家都在戰爭狀態之下，感受到毀滅的威脅，換言之，即當時的歐洲，甚至於全世界，都沒有一處是安全地帶，祇有中國，雖曾參戰而遠在遠東，並且實際又沒有切實行動，故所感到的威脅都較世界上許多個國家爲輕。就在這一個條件之下，中國便成爲歐洲資金避難的安全地帶了。歐洲資金既然大量地流入中國，誠然又是促成中國經濟繁榮的條件。

(三)當時中國一方面除以原料供給歐西各國之外，更因歐西各國因戰爭之故，物品產生的數量，除軍器而外，當然都在緊縮之列，所以本國需要量都在不敷的情形中掙扎，自然是決無剩餘可以推銷到中國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消費又不能因歐戰的緣故而減到毫無消費，何況歐洲資金流入中國之後的中國市場又在畸形發展中？因此在供求律的正軌中，中國爲應付消費起見，便趁歐洲物品不敷分配的機會努力衝擊，終於在無人對抗的局面中，中國民族產業得到了拾頭的良機，進而更獲得了奠定中國近代產業的基礎的條件。

總括以上三篇而觀，我們很顯然的可以明瞭到第一次歐洲大戰對中國影響的良好，是有着當時的時代背景在。而第二次歐戰業已爆發後的今日，其情形是否同出一轍呢？姑不論其他，即以上述三點而觀，我們可得結論如下：

(一)第一次歐戰爆發之時，中國并無戰爭，雖亦爲參戰國之一，但無實際上的作戰行動，故對歐洲各國并沒有軍火進口需要，與歐洲各交戰國家的沒有軍需輸運出口的環境相符合而不至發生衝突的關係。但是這一次歐戰的爆發，中國早在二年之前已經在戰爭的泥沼裏消耗了大半的國力。即今後所需軍需，又無不賴諸歐西各國的供給。但是目今歐洲各國自身尚不暇自顧，那裏還有餘剩的軍器可以滿足中國的要求？換一句話說：今日的中國環境，已非昔日相同，而與歐洲交戰各國無軍需出口的環境相抵觸而衝突之狀，然則，也許會有人疑問：既然此如，

那麼歐洲各國軍器消耗之後，決不能繼續生產軍需，而生產軍需則又不能沒有原料的供給，是則我們何妨再以原料國的姿態，出而與彼簽訂互惠條約，然而，自抗戰迄今，失地如此之廣，一切資源均落日軍之手，一切物產均陷日人統治之中，原料從何而來呢？這一點便證明了兩個時代的貿易機構不同：即前一個時代是對於中國，而後一個時代則絕對不利於中國的廣積作戰。

(二)中日戰爭早在這次歐戰爆發前爆發了，中國在今日，何處不在恐怖陰影下朝不保夕？既然如此，昔日所供安全條件業已完全消失。中國本身既無法保持其安全，那麼歐洲資金雖在戰爭的威脅下到處尋覓避難的去處，也決不會流入今日的中國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然而，非如此而已，歐洲資金不再輸入中國尚且不足，反因戰爭在中國爆發，在「資金必向無風帶流去」的經濟流動原則之下流向外國，作爲逃亡式的避難。所以，中國從事戰爭的結果，尤其是歐戰爆發後的今日，釀成非但不能引致歐洲資金的流入，更進而促成本國資金的逃亡，在雙重壓迫之下，中國經濟資源的日形瀾瀾固無可否認，就倚靠第一次歐洲爆發的機緣而拾頭的民族產業也因而生機斷盡，日趨崩潰之途。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廣積作戰，自然也就成爲極度困難，甚或不再可能的事了。

(三)當第一次歐戰爆發之時，中國民族產業可趁歐洲商品停止生產，市場缺乏物品以供消費的機會，獲得了絕大援助的環境條件，又因本國并無戰爭，不論任何生產機關，開設於任何地帶，均無任何戰爭威脅，繼續儘量生產。但視諸今日的中國，自抗戰軍興以還，沿江沿海各輕重工業區域，幾乎全數毀滅，縱未被砲火摧殘，亦因所在地的淪陷，早爲他人操縱。一切生產，已爲日軍所控制；更進一步而言業已遷入後方所謂「安全地帶」之工業生產機關，亦無一不朝夕盡在爆炸的恐慌中，作其時被破壞之慘淡經營。但三考其營業情形，則所得結果，既不足以增加國家生產，反覺增添無數軍需上種種物品的消耗，徒然增加軍事行動上的困難，誠爲不可諱言的事實。故由此而觀，國家戰時經濟

本極困難，今又逢歐戰爆發，其困難之有加無減，又何庸辯！更進而論諸中國的出口事業，在非戰鬥時期中，向借外國輪船作為唯一的輸運工作，今歐戰業已發生，交戰各國自必徵發其國人所有之商輪，不論公私，概充軍用。中國既無海運工具，出口事業在此情形之下，必陷不能貿易的停止狀態。雖然或有人以為歐戰雖已形成，而中立國的商輪，自無礙其繼續來華工作，然而中立國的商輪，只能運輸普通商品，絕不能為中國運輸軍火，這是顯見的。

總之以上所述，歐戰之不利於我們的唐續作戰，已成不爭的事實，那麼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為國家前途以及民族生計我們決不容勉強拖長作戰時間。誠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國際環境的變遷有如日新月異，但在目前這一環境裏，是絕對不會把有利於我們作戰的關係造成的。比方有人說：歐戰爆發後，凡是與東亞和平有關的歐美各國，其注視中日戰爭的程度必更提高。他們以為就目前情勢推測，英法各國雖將不遑顧及遠東，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却不能不同時兼顧。為他們在遠東的屬領安全起見，勢將不能不設法牽掣日本，否則在英國而論則將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而屈膝於日本之前。其後，美國和蘇聯為了他們的利益，也決不會不加嚴其對日本的監視。——這是多麼可笑的謊言，換言之，這裏竟相反的全盤的暴露了中國唯有靠着英、法、蘇、美的「監視」日本來支撐戰局的弱點。不但僅是如此，更有可笑而令人不可解的共產黨的言論謂：「蘇聯絕無自投歐洲戰禍的必要，德蘇互不侵犯公約的簽成適足以助成其願望。彼既無西顧之慮，則為維護「西伯利亞國境之安全，自不容日本在中國境內從容佈置攻蘇之堡壘。況中蘇「友誼素陸」，又屬國境毗連中國所需之戰爭物資，故不愁無來源。近年日蘇邊境衝突不已，日蘇入戰乃屬遲早間事，蘇聯欲確保對日勝利，唯有在無西顧之憂之今日為最宜。德蘇互不侵犯公約下，英法與蘇聯在歐陸仍未敵對；反之，遠東方面對日的利害完全一致，故亦不難攜手並進。」

從這裏，我們可以窺見共產黨的觀察與不打自招的供狀，非但是完全不確，而且任他如何強調，都無法掩飾其「外強中乾」的破綻。所謂

「蘇聯絕無自投歐洲戰禍的必要，」不知其所指何而云？然今日蘇聯侵略芬蘭，已為人所共知，而獨共產黨則「充耳不聞」，其足稱怪，孰甚於此？總之，時至今日，中國雖稱地大物博，為世界原料供給之魁首，但是抗戰迄今，雖未「全軍覆滅」，失地無數，生產廢敗，自給不足，固論給人。更進一步而言，國際關係的變化，業已促成不能達到國際生產合作的可能，自歐戰發生後，因各參戰國自身的「需才孔急」，亦無法利用技術合作以補遺漏。結果，生產所得遠不敷消費的要求。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能不靠外債以及國外商品的輸入，於是歐洲各國在戰爭環境之下，無法應付我們的消耗時，物價的飛漲便釀成人民生活更難維持的局面。

誠然，我們也不能絕對否認這一次歐洲大戰對日本的影響，也同樣是不利的。比方說，歐戰爆發後，歐洲各國的軍需出口貿易的停止，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對於日本還不能算是嚴重，因為日本從歐洲購運的軍火，數量有限。但間接所受影響則頗大，例如英法完全禁止德國貿易後，日本對德的貿易，就有借重西伯利亞鐵道的趨勢，因此日對蘇就不能採取十分強硬的態度。又如英法因作戰關係，購買美貨數量奇鉅，因此美國就可藉此對日要挾了。

最後，我們站在民生問題為重的立場上，眼看着自抗戰以來所造成物價飛騰，由物價飛騰而釀成的人民生活無法維持的問題，再由這問題促成的社會治安的不寧，處處都是暴譁抗戰之不足救國，反而促國速亡，殃民無底！高言「抗戰到底」的人們，幸以無數同為血肉之軀的同胞生活計，更為五千年來古文明所寄託的國家前途計，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以求不礙獨立自由的和平，毋再拖長時間而自趨絕路，如再作博取蘇聯的援助而繼續從事軍事的消耗，那麼，結果便將無法避免殺身之禍，為中華民族釀成萬年遺恨！故總括一言而盡之曰：抗戰本不利於中國，不得已而戰固無可奈，但得和而不利，則其不利於中國更甚，尤在今日歐戰爆發之今日，歐戰固不利於中國唐續作戰，却利於中國的收拾戰局，從事於和平建設，這倒是一個絕好的機會，為我們注意的。

泛論蘇芬糾紛問題

呂純臣

最近歐洲形勢的演變，證明了歐洲和平前途的黑暗無光，已經成了無可諱言的事實。不過，時至今日，和平前途的障礙重心，却逐漸地轉移到另外一個越發可怖的趨向。這個趨向的轉變，無形中促成了一種恐怖的力量，把整個歐洲的和平加速地推向毀滅之途。這一種不幸情勢的開展，對歐洲任何國家，人民以及其他一切的安全，都加強了幾百倍以上的壓力。於是，其形勢的危險，當然比往昔的情形，祇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爲此之故，我們鑒於我們目前所受戰禍之苦，而對歐洲各國人民將接受的不幸，感到無限的同情，更無日不在爲歐洲和平前途的危殆而抱杞人之憂！然而，我們所感到更加憂慮的，却是中國人民對破壞和平的禍首的認識，依然未能十分明瞭且還有少數的「迷信者」，給過去的宣傳煙幕蒙蔽了他們的視線，始終沉醉在第三國際者誇大的欺騙中。

這裏我們不作任何一方面的袒護，以公正的立場，檢舉事實的演變來作公道的判斷。這樣的工作，也許會需要瞭解歐洲形勢的真象者，得到更確切的認識；其次，我們爲了正義與人道，都覺得有揭發罪惡者的暴行而加以評擊，略盡文化人類對人類社會所應盡的義務。

——最近的過去，德波事件在德國的武裝行動之下釀成了歐戰的爆發，作爲歐洲和平毀滅的開始。當時，我們從表面上來觀察這件事變的釀成以及其經過，以「愛好和平者」的立場來批評，當然是極不滿意希特拉這種「侵略行動」，所以第三國際方面，便又趁著這個「公憤難惹」的機會，一方面擴大宣傳德國的「暴行」，把希特拉咀咒爲「世界和平前途的罪魁」，甚且更有「希特拉一日不死，則歐洲和平前途無日不在戰神的威脅下沉淪於無邊的苦海中」之說。另一方面便不惜施用種種卑劣的手段威脅和利誘，要達到分贖的要求。但是，一般爲烟幕所遮蔽了視聽的人却祇聽見「希特拉的暴行」的一面，因此便也跟著搖旗吶喊，

不管是非曲直，也不確實地去檢討一下仔細的內容，莫明其妙地在一般共產黨的威脅與驅使之下大搦大鼓，其實，實際上怎樣會這樣簡單呢？國際間縱橫交錯的背景，以及一夕數變的關係，都不容我們作如此簡單幼稚的武斷。反過來說，祇有莫明其妙的人才作如此的武斷，第三國際統制下的人才作如此武斷的宣傳來欺騙聽衆，尤其是欺騙可憐的中國大衆，使他們脫離 孫總理所遺留給我們的三民主義去接受共產主義！換一句話說，第三國際企圖把中國滅亡在共產主義的蘇聯的奴役之下。爲了這個原因，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希望沉迷了的中國大衆，應該醒覺過來。我們該明白我們是需要三民主義來維護我們的獨立和自由的，更因爲共產黨居然却持着目前的中國命脈的現在，我們不能不以人民的立場來揭露第三國際的醜聞，以警醒人民的迷惑！

在光德波事件發生之後，蘇聯的侵略行動出現在德蘇瓜分波蘭的事實上，已經成了無可諱飾的鐵證。但是，這樣一點領土的獲得，決不能滿足慾望，自然到處挑端，等待有機會的到來，再啖一塊肥肉。這就是今日蘇芬糾紛的基本因素。也就從蘇芬問題上演出，往日迷惑在蘇聯的宣傳中的人民便似乎有點清醒似的。因此，一向說蘇聯如此爲弱小民族的生存盡力扶助，把蘇聯捧上了天堂的共產主義的信徒們，也覺得難以自圓其說了。於是，也就不惜其已往言論如何，而改弦易轍地說：「

「蘇芬兩國間的嚴重形勢，一日未見消弭，一日不可忽視，一因嚴重的程度不易限制，一因範圍的不易限制；能消弭，是大幸；不能消弭，勢必更趨惡化而無法抑制。不能抑制，大有牽動第三四國而造成歐戰對時期的局面的可能。弄兵如弄火，結果延擱，每每出乎預料之外。如德國對波蘭開火，他以爲可用和「攻勢打退英法，他最初決不料到西線不得不準備生命爲孤注。以蘇芬局勢而論，兩國報告的糾紛一事實，」

迥不相同，未知究竟孰是；但在情理上，無法論斷芬蘭竟然主動糾紛，開砲挑釁。乃蘇聯方面，不但對於國際宣傳芬蘭挑釁，其意若曰芬蘭應負責任；且對於國內宣傳邊境與安全，竟受芬蘭壓迫燃起了對芬用兵的火焰！

「以第三國際對於國際抱負的遠大，我們不能想像蘇聯願意親在從事於危險而愚笨的戰爭；若非犧牲了二三千人可得廿萬里地！因此，我們亦不能想像蘇聯此次對於芬蘭動真刀真槍。事有出乎預料之外的，蘇聯不若既往的沉着，已發動了機關報紙，露天大會，這是動用真刀真槍之前的主要武器；使蘇聯人民感覺到忍無可忍，使蘇聯人民發爲「自資本主義的高壓下解放芬蘭人民的宏願。」雖芬蘭已表示接受蘇聯的要求，自邊界退兵二十五公里，却亦對等要求蘇聯退防軍的同樣退後。以對等條件排解糾紛，似不失爲公道，糾紛理應可望消弭，所未可樂觀者，蘇聯最近的國際辭令中，並無對等字樣，故芬蘭的答復，或將使蘇聯認爲殊難索解。

「蘇聯若果「忍無可忍」而對芬蘭用兵，芬蘭人民若不待蘇聯所謂英美的鼓勵而能自知自衛，對壘抗戰，則強凌弱，衆暴寡，勝利當然屬於蘇聯，勢在必勝，這是不難斷言於蘇聯必不弱親戰爭的重要論據，雖然我們却又殷願蘇聯鄭重考慮，蓋戰事若果一鼓而下，事極簡單，但芬蘭自有藩籬，而天時地利，或使蘇聯不免遭遇相當困難；何況用兵之時，乃至戰勝之後，行將直接間接誘致國際種種必然的後果。以目前而論，英法德交戰是國際問題中的一環，蘇芬糾紛是其又一環，雖每一環各有其重心，各有其個別解決的可能，然惡化與延擱之結果，歐洲將成洪鐘，融合爲一；蘇屆時便成個中一員，非復超越環境而得舉足輕重。蘇聯對芬蘭的可能成就，或比對波蘭的成就爲尤大，蘇聯對芬蘭的意義，或視無異於對波蘭，但所予國際的印象，亦即國際所作的估價，則兩事絕不相同；蘇聯即視國際印象與信價，但所反應於今後各國對蘇聯態度者，必將使蘇聯自身感到新障礙。自前數年以迄最近，國際種種動態之下，國與國相比較：……

惟有美國在一洲是成功者。蘇聯在歐洲

是優勝者。

要知溫和的懷抱淨淨的面目，決非異曲同工，決非各有千秋，同時生存與自由乃人類必然的願望，弱小民族決非下賤動物。因此種種，我們爲蘇聯打算，與其變更作風，追蹤德國，不辭跳入油鍋，企圖芬蘭，寧若葆養真誠，發探真理，務期實踐歷年援助弱小之標揭……

讀了上面這一段爲蘇聯的侵略行爲無可掩飾之後，感到受了欺騙後的失望而發的文章，雖然寫得宛轉徐緩，把蘇聯的暴行祇寄諸一個空幻的「期望實踐歷年援助弱小之標揭，而以仙張正義，恢復和平爲己任」而已，其強調蘇聯的「正義」固可一望而知，其爲共產主義緩頰也甚明顯。但是，不管任何強調與緩頰，由於字裏行間，亦無法逃蔽其失望的破綻，這是一種醒覺，我們在痛心之餘，對被共產主義所毒害了的中國人民的「復活」，感到安慰！

把話題收回來，由於事實與共產黨的「自供」，我們在上面所說的「時至今日，和平前途的障礙重心，却逐漸地轉移到另外一個越發可怖的趨向，這個趨向的轉變，無形中促成了一種恐怖的力量，把整個歐洲的和平加速地推向毀滅之途。」也就是根據着共產黨自許的「惟有美國在美洲是成功者，蘇聯在歐洲是優勝者」一句話裏來的預測。同時，也是根據了「一小強盜爲害於社會治安不淺，大強盜爲害於社會治安則更甚」的原則而來的。所以，我們今後應該明瞭，醫治歐洲的危殆，斤斤從事於抵制小集團的橫行，反忽略了大集團的橫行，是無異於醫治病入，僅僅注意病人的睡眠，不管其內在的劇變一樣的謊謬。既然如此，我們深刻地覺得，不醫治歐洲的病態則已，否則非要把主要的病源的第三國際割除了，他是會永遠產生出病菌來搗亂歐洲的和平，甚而是世界的和平。

至於美國方面，也感受到影響，美國如果能夠永遠超然於一切糾紛之外，許或能夠獲得歐洲暫時的和平，否則，蘇聯的貪得無厭，將種下歐洲和平的永遠的後患。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祇需觀察美國今後所採取的政策便可預先得知一個解答。但是，現代國際關係已發展到了一個

新的階段，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裏如果發生了非常事變，連整個的世界，也要蒙受其不利的影響，因此，這樣的局勢，將壓迫着美國放棄了他的傳統政策。所以美國國務卿赫爾會發表演說，闡明美國的外交政策說：「照目下每天情勢的發展，使事實更加明顯，就是世界任何一地發生事變，均足以影響及美國的政局，不論我們的志願希望如何，別地發生了災難，美國是不能不受影響的。當別的地方為被滅貧窮饑荒所苦的時候，不論我如何努力！我們的經濟幸福更無法避免受到損傷；自由被破壞的地方日益擴大，也就要危及我們個人自由的理想及我們最珍愛的政治社會制度。」——從這裏，我們就明白了美國在必要時也會毅然放棄了他的傳統政策而對破壞和平者予以打擊的。因此，蘇聯的暴行將繼續侵略小民族之後而與強人的美國相衝突。於是，這樣的結果便將釀成人類更大的浩劫。縱使退一步言，蘇聯的侵略行動不會與美國發生衝突而僅成爲世界燎原野火，至少要使歐洲和平甚及世界和平陷於萬劫不收之地。這是必然會賜予人類無限的痛苦！

總之，由於歐洲的紛擾以及遠東的不幸，我們感到國際形勢的不安，到今日已經到達了白熱化的程度。換言之，爲挽回救這既倒的狂瀾，惟有努力促成和平出現於亞洲與歐洲。否則，禍患的普遍深刻與人類所受災難的痛苦必成正比地增加。在歐洲，今日之蘇聯不惜盡其毒辣的兇惡面目，以其列寧格勒城之安全爲藉口，指弱小的鄰國爲威脅而影飾其侵略暴行，片面廢棄協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並且以斷絕外交關係，拒不接受答復，以干涉對方內政，提示改組政府爲和平之要挾，較諸遠東之日本，其狼毒兇惡之手段，豈足以道里計！但反觀共產黨徒在中國的宣传，無不用盡其欺騙煽惑的手段以奴役人民，劫持威脅，不惜破壞不礙民族生存要求的和平運動，而陷國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令每一個真誠愛國者，將感到如何的悲憤與失望？

事實是最雄辯，今日的中歐，能得無礙於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和平而不求，芬蘭之不惜割地求和而不可求，（美國合衆社十一月卅日倫

敦電：芬蘭官方發言人昨晚對合衆社記者表示：芬政府以鄰近列寧格勒之東戈島割與蘇聯以易取和平。）兩相相較，則又使人墮落五里霧中。中國今日之國力如何，芬蘭今日之國力如何；中國今日之國際環境如何，芬蘭今日之國際環境如何，因有不盡同處，惟求人民的能安居樂業，使彼此永存於世的目的則一。既然如此，那麼何竟至一則有和的可能而不和，一則要求和而不能得和，其非爲不願人民幸福之外，則必有其背景在。中國自號爲「愛好和平的民族」，今有和平可求而不求，其爲人所威脅劫持，乃爲顯而易見的事實。故我們觀論亞洲與歐洲目前所釀成的慘局，雖不能盡責蘇聯，但其爲重要因素，則無可置疑。（芬蘭因求和不可得，已從事抵抗，並佔優勢，這是值得我們安慰的。）

最後，我們平心靜氣來分析事實，蘇聯在歐洲的行爲，是否與遠東的日本相差？我們受了日本的侵略而感到威脅的痛苦，因而對日本行動總難免有些憤慨的表示；但是，要是我們設身處地爲芬蘭的人民想一想，蘇聯是怎樣一個橫暴的帝國主義國家？而其實，這不過是一個起頭，我們對蘇聯以後的行爲是絕不能担保不再發生的。故以後我們該從無數共產黨的宣傳刺幕中去切實的認清蘇聯。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坦白的說：往昔的蘇聯所以標揚着扶助弱小民族的口號以眩惑國際視聽，實是在他自己的準備不足，惟恐他人給予進攻，而不得不得以「國際好感」，預爲防備，於是拉着一些不知其底蘊的弱小國家，借張聲威。現在，他已經準備充足了，用不着再需要利用弱小國家的互助，當然，不惜盡食其前言而做一個不義自肥的強盜。今日中國抗戰是能和而不同，直接間接都和蘇聯帶着關鍵。這也是一個很顯明的事實，蘇聯自知在遠東決不能用其全力來應付日本，如不用全力來應付日本，則不能對付日本，因此便利用中國共產黨劫持重慶當局爲他犧牲，等到中日都在精疲力盡的時候，無疑的又是他向遠東侵略的時節，這是無庸懷疑的必然之勢。我們何苦而用自己的犧牲來換取他人侵略成功的條件，這是多麼愚蠢的事！

中國歷代紙幣史述略

汪切膚

引論

中國之有紙幣，當以周鼎爲嚆矢，周禮曰，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廣二寸，長二尺，布參印書，爲幣也。（按載師鄭註布參印書之說，於古無徵）。攷中國紙幣之起，約在第十世紀時。其後漢武帝因國用匱乏，乃創白鹿皮幣，唐憲宗時，亦以錢少，令用飛錢，宋太祖因之而有交子之製，於是後來元有交鈔寶鈔，明有大明寶鈔，清有鈔貫，寶鈔。雖皆行用不久即罷，然於中國紙幣史上，已俱有悠久之歷史矣。

當漢武帝令諸侯王制白鹿皮爲幣，後人因易以爲楮，迄於宋金元明，而交會寶鈔之法，皆自一貫至百千貫，以代現錢之用，究其爲製，不過取方尺之紙，印字其上，而易值數千百錢之物而已。但楮之爲幣，勢而易毀，紙之爲物，質薄難全，即使製造工緻，但經久通行，難免斷爛不可復辨。於是新陳出入之間，動多詐僞抑勒，不能禁止。如明之寶鈔，始用時每一貫准鈔一千，抵銀一兩，會未及中葉，而已漸輕漸減，其後一貫之鈔，竟不足以抵一二文之用。竊攷歷代紙幣之發行，往往利少而病民，爰作斯篇以資證焉。

漢之白鹿皮幣

漢書武帝紀，元狩四年冬，造皮幣，當時縣官，用度大空，富貴豪商累財萬金，不願佐國用，請更鑄造幣以贖用。時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之皮方尺，緣以藻績而爲皮幣，值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饗，然後得行，觀此皮幣，已如紙幣之代用，此可爲中國紙幣起源矣。

唐朝之飛錢

漢武帝既以鹿皮爲幣，而唐人遂因易以楮，造券取錢，謂之飛錢。論者又謂飛錢之起源，乃起於紙錢，雖紙錢係用之於喪葬祠祭之用，不

作交易媒介之物，然以其質地之爲紙，寓意代錢，故飛錢之起源，亦有由於此者之一說。

當憲宗時，鑄錢券鈔引，令商賈至京師委錢給券，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候，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而取之，名曰飛錢，此楮法之所由起也。然其法蓋執券取錢，非以券爲錢。如今嚴格論之，有類現在之匯票，實不得謂之鈔票也。故晉人書錢論有云，「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蓋即形容錢之作用，此殆爲飛錢命名之所由來也。

宋金之交子會子

飛錢既係執券取錢，非以券爲錢，殆上述可謂匯票起源。陸世儀論錢幣有云，「今人家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於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一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鑄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乃以梓作券，謂之交子，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的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使富商十六戶主之。其後豪富力稍衰，不能償其所負，爭訟不息。於是轉運使蘇山，張若谷等，請置交子務，掌其出入，以民私造，上從其議，立務於益州。定每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而有本錢三十六萬緡。至徽宗時，改交子爲錢引，不帶水錢，而增造無已。至引一緡，僅值錢數十文，遂成爲不換之紙幣矣。交子之後而有會子，又名曰關子，然其性質與交子無異，所不同者，交子行於蜀，會子行於兩淮湖廣各地耳。其制有一貫，五百，三百，二百文四等。初定每界以一千萬貫爲額，三年爲一界，逐界遞新收舊，嗣後增子每界以三千萬貫爲額，展期爲九年。由此會子之數增加滋多，價益低落，民益疑惑，終宋之世，未見有整理也。

金銀銅產缺乏，乃做中國之以楮爲幣，造交鈔，其製分大鈔小鈔兩

舊，大鈔票面分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十貫，一百貫，二百貫，三百貫，五百貫，七百貫，五等。與錢並行，七年為限，限滿納舊易新。章宗即位，即罷七年一換之制，令百姓永久流通，惟文字漫滅不現者，可向所屬庫司換易新鈔，此為交鈔字昏方換之始。泰和以後，一貫以上之交易，祇許用鈔與鈔，由是錢價愈低，迄於宣宗貞祐二年，更造大鈔，名曰寶券，始造自二十貫至百貫，其後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不等，先後輕重不倫，民惑滋深，又復屢易其名，畢竟不行，千錢之券，其價值不過數錢而已。

元之寶鈔

元朝天下，皆通用銀，惟武帝時嘗一鑄錢，此外皆用銀與鈔，鈔出益多，價值益賤，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自二十文至一貫凡十等之中統鈔並用，然為日既久，發行漸多，不獨未能收整理中統鈔之效，反步其後塵，益發而不可收拾矣。武宗至大二年，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一厘，定為十三等。迄於仁宗時，罷至大銀鈔，有詔曰：

我世祖皇帝，參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此者尚書省不究利病，率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勿給，新舊資用，曾未再期，其幣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

元之鈔法，至是業經三變矣，及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乃罷至大銀鈔，仍用中統與至元兩鈔，至正十年，以楮幣一貫文，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鈔為母，而錢為子，行之不久，物價騰貴，鈔價益跌，民皆以物貨相貿易，於是公私積鈔俱不能行，視若敝楮，由是國庫大乏，元亦隨之而亡。

大明寶鈔

明立鈔法，始於洪武八年，設寶鈔提舉司，造大明寶鈔，令民間通用，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許，質地青色，外為欄紋，中間鈔貫之狀，

並印實例文字於其上，橫題其額，一大明通行寶鈔，其制凡六等，分一貫，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每鈔一貫，準錢千文，或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商稅課稅，錢鈔兼收，一百文以下，則止用銅錢。九年立倒鈔法，凡鈔雖破軟，而貫百分明非挑搗補者，民間貿易，官收稅並聽行施，使貫百爛斷者，許入庫易換。二十二年更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是時出鈔既多，上復禁用銅錢，以至民間重錢輕鈔，物價騰貴，鈔法益壞。洪武時每銀一兩，當鈔三五貫。至永樂時，銀一兩，已當鈔八十餘貫。迄於正統間，銀一兩，竟當鈔千餘貫矣。是鈔一兩之值，不過值銅錢一二文而已。天順以後，鈔幾無用，成化年間，乃令兩准鈔折銀。弘治元年，復令鈔關及戶口食鹽俱折收銀，斯時鈔已不行。崇禎十六年，雖欲復行鈔法，然以流寇將犯京師勢已有所不能。

清之銀票錢票

清鑒於宋元明三朝紙幣之為害，始乃用錢而不用鈔。順治八年，雖有鈔貫之制，暫准施行，然為數有限，其時流通仍以銅錢為主，故行之而無害於民。嘉慶十九年學士蔡之定，奏請行用楮鈔，奉旨不准。咸豐三年，以軍興需款，籌措無術，議准暫行銀票，又名官票，準庫平一兩二兩，先於京師試辦。後又頒發錢票，準千文二千文以為用，與銀票並行於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以為收放匯兌機關，由庫發給成本銀兩，並以戶工兩局交庫印銀為票本，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之款，均准以官銀寶鈔，五成為率。官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五年河南山東地丁錢糧不收票鈔，致使壅塞難行，有以見發行紙幣，雖由朝廷厲行，而鈔法仍未能暢行自如也。

民國鈔券

自宣統三年冬，革命軍起，改上海大清銀行為中國銀行之後。民國元年十二月財政部以中央政府所設之中國銀行，次第設立，應請在紙幣則例未定以前，即以該銀行所發之兌換券，暫時通行，因酌擬中行兌換券章程五條，呈請施行。民國二年四月十六日公布中國銀行則例，凡三

十條，民國四年十一月財政部爲中行兌換券，未能迅速推廣，會屢陳原因及進行方法於政府。但兌換券爲現幣之代表，在國幣推行未廣之初，上海仍用英洋，銀行發行兌換券，習慣上遂以英洋爲準備。

民國七年上海中國銀行，鑒於各種龍洋行市。久經統一。袁像國幣，流通日廣。爲適應市面需要，及助長國幣勢力起見，決定加發上海國幣券。計分五元十元兩種，票面印明此券兌付國幣字樣。當時各種龍洋行市，本與國幣一律，故該券除兌付國幣外，亦得以龍洋應兌，該券於民國七年五月五日開始發行，是爲上海銀行界發行國幣券之嚆矢。至該行前所發行之英洋兌換券，仍一律照付英洋。迄於民國八年六月英洋行市取消，滬埠銀元行市祇剩一種，更無龍洋英洋及國幣之分，因此華洋各銀行之兌換券，亦不得不隨時代之趨勢，而一律以國幣兌付焉。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間，滬市發生銀洋兩荒之恐慌，籌碼不敷周轉，時滬上各錢莊，因援照銀行領用中行鈔票例，擬向中行領用鈔票，事未果行，遲至次年，錢莊又更聯合要求，經幾次磋商，雙方協議，並由錢莊自開條件，經中行同意後，陸續訂立領用鈔票合同。（中行對銀行同業歷來領券方法，凡領用中行鈔票者，可具備現金七成公積三成，向中行領用十成鈔票，實際上此種規定，每有多少出入。）

交通銀行於清季，即發行兌換券，民國二年另印新券，收回舊票。民國五年奉有命令與中國銀行同爲國家銀行，均享有發行兌換券之特權。同年軍事發生，金融恐慌，洪憲政府有創行不換紙幣之議，其時北京中行庫儲已罄，又密飭滬行移居內地。於是中交兩行發生停兌風潮，各種紙幣信用，大受影響，價格之低落，實所罕見。

民國六年一月，財政部調查各省流通紙幣，其價格按銀兩以七錢三換一元爲計算，總額計爲三億七千三百九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六元。浙江興業銀行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由度支部農工商部，特准發行兌換券。於杭州漢口上海，各埠流通甚廣。民國四年改與中國銀行訂立特約，收回以前發行紙幣，改用中國銀行兌換券，代爲發行，該券總額三百萬，特約有效時間，定於四十二年。民國十一年一月六日，復奉幣制局批准，繼續發行，因定十元五元一元三種兌換券，於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發行。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銀行，因鑒於經濟趨勢，有厚集實力，聯合發展金融事業之必要，因有聯合營業之規約。上海之

國行準備庫，始於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發券以來，均根據規約章程，切實辦理。

政府對於鈔券制度，向主統一，發行紙幣之權，採取少數國家銀行發券之制，以示限制，除特種銀行其制定條例之際，經財部特許發兌換券，載明於條例，以及原曾發券之普通商業銀行，財政部核准有案，仍許發行者外。至其他各銀行錢號，均採限制主義，未發者不准新發，已發者限令收回，並由中交兩行原定領用兌換券制定，俾原有發券各銀行，領用中交二行兌換券，但迄未實施統一發券之計劃也。

民國七年八月十日公布金券條例，與發行金券，結果未能實行。鈔法之重，莫甚於明。但僅禁令偽造，并非禁止民間之擅發。如民十年七月二日，上海中法實業銀行分行停止營業，後由上海二十九家銀行代兌該行鈔券，共計鑄出二百零九萬九千一百六十二元。

民十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銀行成立，享有發行兌換券等之特權。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政府改革幣制，指定該行與中交農三行所發之鈔券，同爲法幣，通用全國。於是鈔券，發行益有顯著增進，其後遂照政府決議，修正中央銀行法，募集商股，改組準備銀行，以完成銀行之銀行之使命，調整金融焉。

結論

自漢武以鹿皮爲幣，爲中國鈔幣權興，嗣後宋明兩朝均有鈔制，而宋之行用尤廣，前清因之，亦有所謂鈔幣之制。迄於民國成立以後，紙幣通行全國。最近法幣，狂跌不已，雖有一般經濟學者加以粉飾與曲解，甚有謂跌值反而有利者，可見抗戰經濟之基礎，事實上已見動搖。目前重慶政府正在掙扎，欲從對英之依賴，轉而爲對美之依賴。原來中國法幣依存於英鎊，乃是中國經濟依存於英國經濟之綜合表現。此爲國人所屬知之事實。然在社會方面，法幣跌價，影響整個國民生活之毀壞甚堪，所關不淺。蓋立「一經常」之事，而戰爭乃「非常」之事，立法爲維持秩序，而戰爭乃破壞秩序，二者適得其反。故在金融資本時代，貨幣問題不僅是經濟之規律總和，而是經濟規律與政治規律之總和，適有從處理一般的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入手以處理貨幣問題，然後貨幣問題始能解決，本篇於此限於篇幅，不復爲之詳論。

譯

著

論中國問題

日本評論

本文爲日本評論十二月號之社說，原文無總標題，因其所論以中國問題爲中心，故以此題冠之。此文以其讀者日本人爲對象，乃是向日本人說的話，但所說述的是中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關心。日本的知識層即領導階級，對於中日事變之解決及中國問題究竟抱有怎樣之見解，我們很有知道之必要。本文所表示的，可以代表一部分的意見，因譯出全文，以饗讀者。

一、論和平運動及組府問題

關於汪兆銘組府問題的經過，我們未得詳細的報告，不知其展開之情景，但我們信其有順利的進行。

汪兆銘所領導之和平運動，從七月十日的廣播演說而表面化以來，已經經過四個月以上的時間，而萬衆所盼望之新中央政府之成立，尙未有確切之日期可說，這當然不是汪運動的無辦法而遲遲不進，一定是爲將來之發展雄飛構築堅實基礎，須有萬全的準備，故，偉大的運動，非可粗製速造，革命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與其速而不達，何如大器晚成，不須性急，要有忍耐。但是政治須乘時而動，時機決不待人。時勢小絕有變化，所謂時勢方能把握時機，在日本方面及汪兆銘方面，都須有英勇的鬥爭，勿可拘泥於小節而浪費時間。倘衆訟紛紛而在再不決，則問題將陷於深淵，我們敢作嚴肅之警告。

但我們並不因此而勸汪氏屈服，汪氏相信其近衛聲明，響應近衛聲明而起。在近衛聲明中，並無要求中國屈服的任何條件，此聲明又根據於御前會議，爲日本不動之方針，決沒有一個日本人想違反此聲明，或懷

糊此聲明的，在日本維持此聲明不變時，我們所求於汪氏的，在汪氏決不致認爲是屈辱的。不但如此，汪氏之爲人，倘若甘受屈辱，或可以爲一身之故而作賣國之舉，則我們也一定不以此人爲對手與不以蔣介石爲對手一樣，我們只能選取有良心的愛國的，爲國家之故而忘其一身的人爲對手，這是日本精神，只有如此乃是日本精神。

野村外相會說，新中央政府非爲強有力的政府不可。所謂強有力的政府是什麼呢？擁有武力固然也是必要的，但在今日，第一須是值得國民的信賴的政府。所謂值得國民信賴的政府，當然由於當局者之人物如何，而此人物必須兼有担負中國大任的力量與信用，此就今日中國之現狀言之，第一必須爲能解決戰亂的人物，第二爲貫徹抗戰之目的，即必須爲能保障中國之獨立與自由的人物。

第一，即是和平問題，在此問題上，新中央政府負有 重的任務，完成對日本之和平工作爲其一，壓服重慶方面而完成中國之統一爲其二，如何去完成對日本的和平呢？又怎樣才可以使此政府成爲中國唯一的中央政府呢？把這個問題 仔細推究起來，結局就在其能否滿足中國民衆之要求及能否得其信賴而定。要求之能否滿足，信仰之能否獲得，在日下却就在於中國之獨立與自由是否得到保障，因之，此政府之爲強有力與否，一又面固在於汪兆銘氏及其周圍的同志之人的要素，而同時也有關於日本之態度如何。在這一點上，我們知道日本有責任，此責任是嚴肅的。我們不可忘却汪兆銘及其一派是響應了日本的近衛聲明而起來的，並且不可忘却該聲明中約定尊重中國的獨立及主權。遵守此諾言與否，固然有關於日本的信義問題，同時對於何故發表此聲明，及此聲明在

日本有何意義，亦必須作虛心坦懷之反省。兩國民衆之相互理解，始於相互之自己反省，而完成於相互之愛。近衛聲明爲什麼而發表的，又是爲什麼而非發表不可的呢？

這當然是表示日本的公正的立場，日本所求的，是東亞永久之和平，而非其外的任何物，近衛聲明即是表明此種立場的，關於此點毫無可疑。但日本在自己表明時行自己反省，或在自己反省時作自己表明，日本有此寬容，而入於此過程，而且自己表明了進入於此過程中。日本是由此而表明了沒有侵略中國的意圖，並且同時也表明了中國是不能被侵略的，我們於此得見日本之新方向，日本自己宣言了他的新方向。

此聲明之第二意義，爲對中國方面的呼求，而這個呼求不是終於無反響的，可由汪兆銘及其一派的神奇的脫出重慶，而起來作呼應，以爲證明，故近衛聲明，即便未曾全面的觸動重慶方面，但已切落了牠的有方之一翼，並且由此而產生出新中央政府之可能來，故也可以說是充分成功的。

但是，自和平運動表面化以來，已經過四個月以上，而爲新中央政府母體的中央政治會議，亦尙未誕生，又是何故？

近衛聲明當然其只決定了原則，聲調中日關係漸次具體化以後，必有幾多迂迴曲折，在此具體的諸決定未成立之前，新中央政府無成立之可能，並且若無此種基礎工作，則成立的新中央政府亦不會是強有力的。但基礎工作又是什麼呢？並且基礎工作上的基本問題又是什麼呢？推究起來，則結局就在於新政府之爲真正獨立政府而能當其自己的責任與判斷，與日本提携，參加東亞新秩序之點，是否得有保障。

、新中央政府之重心

新中央政府之如何構成，不是已經沒有問題了，關於爲新中央政府母體之中央政治會議，各方如何分配，報紙上已有若干記載，此種記載是否真實，以及是否已經決定，我們不知，但對於此問題，我們沒有可以說的話，第一這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中國內部的問題，只要沒有共

黨參加，我們對於此事，並無什麼要求，也不應有什麼要求。

關於政府內部之構成，若容受外部之干涉，由此政府豈能說是獨立的政府，又安能望其爲強有力的政府。

中央政府如何構成，乃是中國內部之問題，我們聽憑中國之自由，而避去一切於干涉的言行。但日本已相信汪兆銘之一氣，而認其爲新政府之重心，沒有汪兆銘一派之和平運動，便不能想到新政府之組織，或有人將說，已有臨時政府維持新政府之存在，但此爲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在其不能發展爲中央政府之點，才發生汪氏領導之政府之問題。新中央政府之爲汪氏領導之政府而非爲汪氏領導，政治不可，是與太陽同耀明白的，我們所希望的，乃使其名實均爲汪氏領導之政府而已。

在汪氏領導下國民黨已經表明網羅各派及無黨無派之士以組府之意，由此可見他們並不企圖國民黨之同黨專政，已極明白。中國在現下的過程中，以國民黨專政爲適當，由或網羅各派及無黨無派爲適當，其見解因人而異。但在汪氏領導下之國民黨已經自己否定了一黨專政，而向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求其協力，此等部分分子亦已應聲而起，則此點已爲決定之事實，故可不必再論，問題是在使此等諸勢力來怎樣參加，及到何種程度。

此問題看去似爲極困難的，在實際問題上，也確有若干技術上的困難，但從今日緊迫之情勢下言之，却不能爲此種技術問題而多費時間。再從今日中國大勢上看來，除共產黨外，並沒有可以和國民黨相提並論的黨，所謂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原不過表示排棄國民黨之一黨專政，而復歸於德金克拉克西的原則，使野無遺賢之意而已。因之這只有原則的重要性，若就實力之比而言之，是無庸過於重視的，故切不可拘泥於此小問題，而貽害大局。

組府只有以汪兆銘所領導之一派爲中心，而且須爲壓倒的中心，倘使此原則有所破損，則中國的民心便難以把握，因之對於該政府之前途，亦難有多大之期待。

新中央政府組成之可能，特別發展爲強有力政府之可能，在於用汪

兆銘所具有的國民之信仰，並及國民黨多年所培養，在今日也仍繼續著的人才，組織及地盤，使再組織而活動起來，除此以外，沒有人能談到新中央政府，特別為強有力的新中央政府的。知道中國現狀的人，不能不承認此事實，因之支持新中央政府者，就非得支持汪兆銘所領導之一派不可。

三、使和平運動為愛國運動

在汪氏領導下之政府成立前，我們要警告日本國民，第一須支持汪兆銘及其所領導之一派，第二，勿使他們為漢奸。」

但若因此而有了違背近衛聲明，蔑視中國之獨立與自由，新政府之背後有日本存在，而此政府不過是一個傀儡的印象，則此政府之發展性，亦就告終止。從而樹立新政府之意義，也完全埋沒了，此種政府乃是偽政府，沒有能把握中國的民心之理，因之不能成為強有力的政府。此種虛偽，與公止之日本精神是不能兩立的。

不必說我們提示了關於和平之基礎條件，就中以經濟合作，視為最重要的。此種合作，若不能順利進行，便沒有進展到東亞新秩序之可能，亦沒有進行到中日提携之可能，因之關於經濟合作，中日兩國之間，至少須有先行決定原則之必要。

關於經濟合作可以想到的三點，其一為資源之利用，其二為利用資源所生之技術的關係，其三為通商關係。

關於第一及第二，可以想到在煤、鐵、棉花、鐵路、等項，其經濟合作之原則，既經承認，中國以此等資源解放於日本，應有利用日本的資本及技術而為新開發或再開發的協力之準備。但此等一切，同時須純粹為經濟的，並須建立在平等及互惠之原則上，不可由此而作經濟上之侵掠，即不可以此而化中國為殖民地，使開發公司行東印度公司之任務。

對於通商關係，從經濟合作的立場上看來，中國與日本之間，應結相互援助之關係，因而新的關稅協定是必要的。關於此點，也必須是

相互的，即中國關稅之改革有其必要，而同樣日本也有改革關稅之必要，應由平等互惠之立場，相互作改革，而建立新的通商關係。

關於貨幣問題，應有充分之檢討，可不待言。其由此問題而維持第一國的在中國之支配權之點，必須予以糾正。但日本於此點上，也只能為忠告者，而不是支配者。貨幣制度，若受他國支配，從而不能作自主的政府，不能稱爲獨立政府的。

如此，中日兩國之間，剩有許多懸案，但尊重中國之獨立與自由在互惠平等之立場上，處心坦懷而討論之，則未必一定為困難之問題。要點在相互信賴與相互尊重。倘能相互信賴尊重，捨小異而取大同；放棄利己主義，站在東亞大局上而有實行之果斷與勇氣，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又倘拘泥於小異，而此種問題也不能解決，則東亞新秩序之理想，何能望其實現。

我們深信中日兩國之負責當局，他們不是在種種交易上發生爭執之商人，是排除一切俗論，抱負東亞大理想而起來的大政治家。我們深信仰此等人，而期待其有所作為。

日本當局所當面之問題，亦充滿着難關，國論雖似有統一之形，而俗論到處橫行，日本精神雖激揚，而俗論仍復橫流，在此等俗情與俗論之中，要樹立國家百年之大計，極容非易之事，只有認識獻身的努力，才可以率領了國家，而向此大目的進行。

汪兆銘及其所領導的一派之苦境，恐比此更須加倍，彼等被呼為漢奸，被斥為通敵；在一切惡名與危險之中，毅然挺身起來，當然中國民眾必能漸漸理解他們的真意，而有感謝他們的時候到來，他們是在從漢奸到救國的英雄之過程中，而重慶之政治家，則在從英雄到沒落之過程中。但此歷程，是否能順利進行，須視新政府能否健全發達，而新政府之能否健全發達，須視能否由他們的手中實現和平，而確保中國之獨立與自由。

使汪氏及其一派之信用與才能，有充分之發揚，這是汪氏及其一派之活路，也是使新政府成為強有力的路，同時也是解決事變的捷徑，又

是使日本之主義表白於世界之方法，以竊立，以信行，燃起了偉大之火而前進。

四、重慶之危機與日本

與新中央政府之發展同時，重慶內部之變動，是可以注目的。關於重慶內部有種種風說，但不能一一置信，恐怕反是不可信的居多，依最近的情形看來，則有確切的二件事實。其一為渝共兩黨間的迫切之關係，其他為和平傾向突呈顯著之點。此兩問題又相互關連，而使重慶內部陷於混亂之狀態。

十月十九日新華日報所載毛澤東之社論，使重慶內部發生異常之激動，的是實情。他的論文，表面上陳說維持統一戰綫，在這一點上原不過反覆着向來的立場而已。但發表此論文之目的，是針對妨害統一戰綫之一羣，其勢甚明。最近渝黨秘書長朱家驊對合衆社特派員發表的談話，可以視為其答覆。

說毛澤東的論文是抽象的也可以，但此論文之目的，無疑是對於渝府及渝黨內部的和平空氣之彈劾。共產黨的立場為永久抗日，此立場是使共產黨達到今日之強大的原因，也是使共產黨維持其明日的生命之途，故照共產黨的意思，必須拉國民黨為同伴，而走永久抗日之一途。於此有共產黨之權謀，政策及存在之基礎。

國民黨之立場，與此自不相同。渝府渝黨之能否與共產黨絕緣，不顧其反對而向和平邁進，原屬疑問，但自王寵惠談和以來，孔祥熙，張羣，朱家驊相繼論此問題，則和平機運之漸次成熟，已毫無可疑。

歐洲戰爭使重慶政府陷於絕望之深淵，繼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在波蘭所取之行動，予中國以異常之反響。重慶方面因其最有力之後援者激動者之英國之參戰，而不再望其援助，而且英國反變為顧忌日本，想獲取日本之歡心而對中國勸告和平了。另一方面煽動者蘇聯，與全體主義的國家提攜，又公然對波蘭侵略，表出了也許即將伸其侵略之手到中國來的一種事實的教訓。

英國不可恃，蘇聯更不足恃，而美國的注意於又專注於歐洲，於是重慶不得小陷於絕望之深淵了。

他們所履有唯一的路，是通過了美國的手而進行和平的工作，與共產黨絕緣而與日本直接講和是另一問題。要點在於和平，而所履的也只有和平之一途。因此，這二二個月間，重慶充滿了和平的空氣，抗戰派之勢力，漸次凋落，而其結果，渝共兩黨之間，開始公然的鬥爭。

蔣介石本人還沒有表明其態度，恐怕他是一方面激勵和平派，他方面撫慰共產黨，而取兩頭政略，一方面造成和平之機會，他方面拉攏共產黨到最後的地步。何以故，因若無蔣介石之諒解，沒有一個人敢在重慶公然談和平，又在國民黨的公然提倡和平之前，共產黨尚不脫離統一戰綫，則可以想到與蔣介石之間，必有何種之諒解。

如此，重慶方面之空氣一變了。這雖則也可以看做是妨害新中央政府之樹立，及妨害新政府之手所進行的和平工作之陰謀。但無論如何，這已露了重慶抗戰力之消磨及除和平外已無他途可走，是無疑的。會有日本與重慶直接進行和平之流言，也是在此種空氣之中產生的。

我們當然不相信此種流言，日本的當局者不必說，即在日本的任何部分，也不會有此種陰謀家的。在汪兆銘所領導的和平運動表面化之瞬間日本就與重慶斷絕了。在這瞬間，日本已不承認重慶勢力為中國的中央政府，因之永久納絕其為交涉之對手。重慶方面有向日本求和之自由，也有中止抗戰之自由，但日本已不願再聽重慶方面的話，當然更不會與重慶開始什麼和平交涉的。倘使重慶方面真的要和平，願沿近衛聲明之線而參加東亞之新秩序，則可以解散其政府，放逐蔣介石，而來參加新政府，由此新政府而進行和平交涉。

這是日本之立場。此立場是絕對的。重慶方面應認識此立場，日本亦不可放棄此立場。倘使日本能堅持此立場，同時堅持近衛聲明之原則，而力加強新政府及其自由之發展，則重慶方面之崩壞，不過時間問題了，而且其時即在不遠，重慶是在崩壞的前夜之光景中。

但是，反之，萬一新中央政府終於流產，（這是不會有的事）或者即使成功而缺少獨立性，不能把握中國的民心，因之不能成爲強有力的政府，則瀕於危境之重慶勢力，或得死灰復燃，亦未可知。本來這原是不會有的事。但我們對此有重大之關心。這一個月中間是中日事變能否得以解決的重要時期，不可就誤此時機，今日最緊要的，乃是根據於鐵的意志，以聰敏及遠大之理想，而產生決斷。我們始終相信公明的日本的當局者，必能排除俗論，統一國論，捨目前之種種小利，不顧種種小感情，而支持近衛聲明的大原則以進行，是最所希望的。何以故？因爲此乃斷絕中日間紛爭的禍根，而樹立永久和平的惟一之路。又也只是由此，日本可以顯揚其信義於世界，而使世界信服日本的唯一之路。

我們以此警告全日本，倘若就誤了此機會，則在中日關係上，或在日本本身上，都是極嚴重的事態。

五、美國問題與中國問題之關係

與中國問題同時，美國問題也增加其重大性了，英日問題進入於休息期而美日問題替代了出現於舞台。

美國問題，直接的是通商條約，此條約到明年一月廿七日失效，必要有新條約，而締結新條約之可能，大有烟雲迷離之狀。

從這意義上看，美日問題之重要可不必說，美日條約是應該繼續的。若沒有新約，日本所受之打擊，決是不輕。日本始終須要爲爭取新條約而奮鬥。

但日本並不要因此而站在被動的地位，至於對美呈媚態，更屬不必。日本必須始終正堂堂。通商條約爲相互的也只有爲相互的利益，才可以談到。對於商約，與日本之有其必要相稱，美國亦有其必要，與日本所希求的程度相同，美國也在希求，如此方能締結通商條約。單方面的通商條約，只存在於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

我們並不想征服美國，也不想被美國征服，從而沒有強美國以其所不備之條約之必要，也無須強求日本所不需要的條約。

美國輿論非常反日原是事實，但日本沒有一點反美思想，則美國的反日空氣極濃厚，却是何故？我們並不說這完全是美國的責任，美國的誤解。日本若有輕視九國公約的情形，就不能獨責美國的輕視美日條約，我們知道這點，也覺悟此點。

美國問題，一言可盡，即是中國問題。美國之反日空氣因此，廢棄通商條約因此，締結新的困難因此。

美國對日反感之原因有二，其一爲美國在華權益問題，其他爲中日關係的問題，前者爲直接的，後者爲間接的，但同爲中國問題。格魯大使在日美協會晚餐會席間率直吐露美國國民對日本之不滿，而謂不滿之原因在於在華之權益問題。問題倘僅如大使所言的權益問題則便極簡單了。日本毫無侵犯美國在華權益之意，或從前在軍事行動之必要上，也有觸及若干美國權益之處，那是難以避免的，美國決不致於不予諒解。今後日本取怎樣的態度，乃是今後的問題。日本既說明爲軍事行動之必要，因而在沒有此種必要時，美國權益之將被尊重，爲自明之理。日本在與中國戰爭，不是與美戰爭，因之沒有要侵犯美國權益之理，並且亦更無此意。美國所關心的，倘只限於此點，則惡化之美日關係，可以一日就得改善的。

又美國之對日發生惡感，倘如一部人所信，單單是因了中國方面之宣傳，則事實必能勝。宣傳，我們不把美國人看做可以因了中國方面的宣傳而興奮的衆愚之集團。誤解是應該解除的，應該訂正的，我們在此點希望日本國民更加率直。

但問題不在過去而在今後，美國之所就心的，也是在今後。日本今後之對華政策如何；是規定今後之美日關係的。我們所當面的是這一點。

我們率直的講吧，第一美國視日本爲對華侵略者，第二以日本的新謂東亞新秩序，視爲日本征服中國之別名。

日本之是否對華侵略，聽憑美國去判斷吧。我們把問題限制於今後之中日關係，因爲美國的關心，以今後之中日關係爲主。

日本果是侵掠中國嗎？東亞新秩序果是日本所宣布的對華征服之原則嗎？

當然，日本不想企圖征服中國。東亞新秩序也不是日本所策劃的對華征服。但這的確容易被誤解。對美國當然要過去，但不必要的誤解也須解除，我們負有一種責任，屏除此種誤解之迫，不在於語言，而在於行動，在於實踐。

日本既以近衛聲明，全心的規定了日本之對華行動，美國不照此聲明字面全部的意義接受，誤解是因此產生的。日本若照近衛聲明文字所示的實行，則美國的對日本懷疑之理由，在瞬間即消滅了。這就看這一個月以內的事好了，就是新政府是怎樣的，日本對於新政府的要示是什麼？是這一二月以內的問題，因其做法如何，而可以表明日本對華態度之全貌。

我們始終相信近衛聲明，新政府依此聲明的錢而產生，故相信且期待其為獨立自由之政府，此期待決不致虛空。而在此期待達成時，美國之杞憂，亦可以掃除以盡。當然這也不是因顧慮美國而然，因為近衛聲

明不是對美國而發的。日本自主的發出，又係從自己判斷而選取此途，並宣明之。並且日本若照字面而實行此聲明，則美國誤解就自然解除了。美國誤解之能否解除，但看近衛聲明是否能照字面實行。

或有人說，美國嫉忌東亞新秩序，乃至中日經濟合作。但假定新政府有完全的獨立自由，而毫不受日本的掣肘，則自日本與自由中國之間，無論成立何種關係，沒有要美國來干涉的道理，日本也沒有顧慮美國的必要的。美國既自己先倡導，而且實行了門羅主義，則對於同這樣式的東亞新秩序，美國決不會有干涉的理由，資格甚至於興味。又，無論美國出於何種態度，日本與中國的自由，沒有要受其管束的理由。美國的健全輿論，必能理解此點。

反言之，美國問題，同時即是中國問題。看日本能依照近衛聲明的字面實行與否，美國的問題，也同時得到解決。

美國問題不足憂。重心在中國，而且就在於新政府是怎樣的政府及日本所求於新政府的是什麼之點，在想到美國問題時，反而是中國問題益見重要。（完）

歡 迎

批 評

介 紹

交 換

訂 閱

日美通商問題

竹內謙二著（載日本評論十二月號）

一 問題的範圍

日美通商問題，所以成爲日本現在最重要問題之一。是因爲七月二十六日美國政府通告廢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之故。廢約的效力，將於六個月後，即明年一月二十五日發生，設期前不講求何種對策，則日本必將蒙受極大的不利。故對於日美通商問題的範圍，有加以考察之必要。

據國際聯盟發行的本年版「世界經濟概觀」，米特氏對於此問題，作如次之解答。「對於日本官憲在中國占領地域所取的行動，美國政府認爲破壞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原則之語言，於一九三八年十月提出抗議。美國政府提及華北施行管理外匯，在日本支配下的當局者所實施改訂關稅率，創設有獨占權的特殊公司，如華北電報電話公司，組織日本公司以經營本島公共的壽島碼頭，禁止美國及其他諸國在長江下游的航行等等。一九三九年七月，美國廢棄對日本通商以惠惠特遇的通商條約」。

即使不引用前項解釋，也可知道日美通商問題，不限定在於日美兩國通商關係之中，而與日本在東洋的行動有關係。而所謂日本之行動，亦不限於現在進行中的中日事變，並且也包含滿洲問題在內。因之在考察本問題時，在日本以外，尚須顧到滿洲及中國占領各地區，即近時所使用的日圓集團之區域。

現在把這樣的日美通商問題，就其與近時的國際情勢之推移及世界經濟發展的傾向相關聯而討論之，以爲理解日美問題之一助。

二 相互依存之程度及方向

不論在個人經濟或國民經濟，甲乙之間，若各有一百萬圓的賣及買的交易，則甲乙間的相互依存關係，爲各半相等。若甲從乙買一百萬，

而乙只從甲買五十萬，則乙方是受着甲方的恩惠了。——這是通常的想法。但此種想法，不是無條件而完全妥當的交易。所交的商品，在當事者有怎樣程度的必要。對於該商品的需要，是否不能禁壓及限制的或者有無代用品可以替代。又此商品是否另有第三者也是需要的。最後，該商品生產者之個人或國民經濟上，有怎樣的重要程度，等等許多條件，非加考慮不可。

就日美貿易關係而論，近數年來，日本對美國有巨額的入超，從而可以說日本應爲美國尊重的顧客。從昭和九年到十三年（一九三四—一九三八年）五年間的合計，對美輸出總額約二六萬萬圓，輸入總額約四五萬萬圓，故輸入超過額達一九萬萬圓，輸入對輸出爲九與五之比。這種金額，在日本看起來，是很大的，故從日本看來，往往以爲對於美國施有恩惠了。而事實上，在該期間中，美國的輸出超過總額，爲七二萬萬圓，故對日本的出超占二七%。在這一年上，日本的是美國的好顧客。當買方比賣方爲有利的立場時，則根據上項關係，日本的發言權，可以相當有力。但是我們不可不注意，在這一點上與過去相比較，最近在發生重大的變化。第一，日本的輸入能力，在減少或停滯中，第二，日本以外諸國的輸入能力在急激的增大中。

次，再就輸出及輸入分別觀察之。在美國總輸出中，對日輸出所佔的百分比，於同上的五年間，在七·七%至九·八%之間，均在十分一以下。昭和十二年日本從美國來的輸入達一二萬萬餘圓（輸出六萬萬餘圓）的最高記錄，但比數仍只八·六%，其次在美國的總輸入中，日本的輸出在同期間爲六·四%到七·四%——由此可知，在美國看來，日美的通商關係，只有十分之一以下的重要性。

那麼，在日本方面看來是怎樣的呢？依外國貿易表所記，日本的總輸出中，對美的輸出在同時期中爲一五·九%乃至二二·一%即在十分

之二方有，而輸入方面，爲三〇·六%乃至三四·三%，即在三分之一前後。但因此數字是指日圓集團（即包括滿洲，關東州及華北在內）故有加以剔除之必要。最近一年間的百分比如次表：

向美國的輸出

從美國的輸入

對總額百分比	二〇，一	一五，九	三三，三	三四，二
對第三國總數的百分比	二六，五	二七，六	三六，三	四〇，二

這樣除了日圓集團，美國在日本爲其市場有四分之一，爲其物資供給國有五分之二的重要，不能不說兩方面都佔有重大之意義的。

最後的考察具體，從重要貿易品而作，日本向美國輸出的，以生絲爲大宗外，尚有罐頭食物，陶磁器，雜物類玩具，植物油，除虫菊，茶，帽子帽胚，樟腦等。就其金額而言，除生絲達三萬萬圓左右以外，其他各品，均爲幾百萬圓的，在幾千萬圓的商品却不多。特別在昭和十三年更是很少了。看了上述的各品目可以說，這些商品在美國不是絕對必需品，而且除生絲以外，都可以從別的地方輸入替代品的。並且這些商品大都以輸出爲目的而生產，所以產的大部分又以向美國輸出爲目的，最後，這些商品是包括養蠶的農民在內的中小企業的生產物。

從這件事情看來，日本在輸出入貿易上的地位，極爲脆弱。美國若實質上斷行廢止通商航線，則終果，而產生對於日本船的一切輸入品課原價十分之一的關稅，或依國家稅率或照傾銷稅徵稅，則在日本之輸出入貿易上，從而在日本經濟全體上，將發生重大的後果。

從一定的見地，（軍事的或其他的）說來，沒有一定商品是絕對的必要的。但是從需要者而說，特別在從事於該商品的營業的人，則是成爲生命線的，日美通商條約之實質的廢棄與否，不能單就日美通商本身上判斷，可不必說。所幸者，美國是經濟上最取自由主義的國家，向來關於日本商品之交易，加工，販賣，消費上所成立的事項，一定能充分尊重的。特別在世界的現勢之下，能够與日本站在競爭地位的國家甚少

時候。故在這一點上，關於從日本向美國的輸出，也許還有戰戰兢兢的必要。反是只要根據自由市場的原則，向低價良品方向努力可矣。日本所仰賴於美國的輸入怎樣呢？在戰時體制下的日本，輸入品的大部分爲軍需的資材，可毋庸說。在「世界經濟概況」中，依柏林景氣研究所的調查，載有次紀的數字的統計。

日本的輸入貿易（單位一百萬圓）

輸入總額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八年
內一直接軍需	二，七六四	二，六六三
內一其他	六六〇	一，二四七
	二，一〇四	一，四一六

這調查有多少的正確性，原是問題，但是從美國的輸入中，應可以發現類似的狀態。最先，棉花所占從美國來的輸入中的地位推移，是很有興味的。到昭和十三年爲止的五年間的變化如下記：

年分	昭和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	五，一	四五，六	四三，六	二四，九	一八，一

其實際金額，則昭和九年在四萬萬圓以上，而十三年且不及其半僅一萬萬另六百萬圓。日本的棉花之供給，非完全仰賴於美國，但從美國所輸入的部分，每年日本棉花消費總額中，大概占相同的比率，（四〇%左右），故從右表亦可親見日本戰時形勢之反映於輸入事情上之狀。姑舍此不論，棉花輸入減縮到這樣程度，再要減制是不可能了，可以說戰時體制下日本所絕對必要的。在這意味上，日本的輸入美棉，已不復是日本給予美國的恩惠，反而是可以說相反的話。

其次應當看一看國防資源方面了，引用下面的一段話已足。在小島精一氏負責編輯的「日本重工業」雜誌上記述着——「從國防工業的海外補給之點看來，現在如論如何，美國總是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從海外所輸入的國防關係品之中，有半點以上是從美國輸入的。這些又是從石油，（一萬萬數千萬圓）鐵材（八千萬圓至一萬萬圓）銅（三

四千萬元)等主要工業原料,以至機械,汽車,飛機(均各數千萬元)等高度科學品,從國防經濟的見地看來,實可以特別注意的。(見該雜誌十一月號所載日本重要原料供給與南洋諸島一文中)。

以上所說,僅以昭和十一年之資料為根據,若再想到以後的情勢,則正是可以驚嘆的。就以上所說的或所想像的關係,美國與日本兩者地位之優劣,是怎樣的呢?在美國經濟界若於不振的時代,雖不可說,在今日即第二次歐洲大戰勃發之後,可以不必多言的吧。「重要的製鐵公司」,繼續燃點了熔鐵爐的火,從採礦到製鋼行一貫工事的太公司,則致力於採收原礦工作了,並且製鋼公司的年生產品,已全部售罄,消費者方面且爭求預約明年第一期的出品。另一方面,銅屑的市價早已激漲,第一等銅屑已創出二十四美元乃至二十四美元半,(戰前為十六元)的高價,開第一次歐洲大戰後最高紀錄。(載日本重工業雜誌)。又在美國議會中,通過了修正中立法案之後,英法向美的定貨,包括飛機,發動機,運貨汽車,機器腳踏車,機關槍,彈藥及其他醫療器械等,傳聞已達十萬萬美元以上,日本銀行紐約分行方面來電)以對美基洋二十三美元者,換算之,實達日元四十二萬萬六千餘元。

在這一項的末了,再略述海運與僑美之日人。日本的海運對於美國依存的程度如何,原來不是我能闡明的。但就通過蘇彝士運河的日本船舶噸數,與通過巴拿馬運河的相比較起來。前者從一九二一年以來,並無多大變化,一年間大概在一百萬噸到九百萬噸之間,後者自一九一九年的三十四萬噸遞次增加,到一九三七年已達一百七十萬噸。雖則經濟活動的意義,不可以噸數來衡量,而通過巴拿馬運河的不一定到美國,但也可以窺見,日本海運之依存於此方面也有相當的大。若美國實行廢棄航海條約,以噸稅,港稅等手段而壓迫日本海運,則日本海運商上及航海上所受的損失,決非淺鮮的。

僑美的二十六萬日本人,不至全部直接受簽約之壓力,但由於所謂商業居住者之點以及他們所購的日本商品,要受本來所沒有的種種限制,而受着極大的不利。此點亦有詳細檢討之必要。

三 對德貿易之意義

日本在接到七月二十六日的廢止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的通告時,在新聞紙上,至少表面上,以為美國的採取此種處置,早在預料之中,並無多大的意義,表明了此種見解。其後不久,七月二十九日,有日德貿易協定之非正式簽訂。關於此事,外務省情報部長說——

「協定的內容,非待正式簽訂後,不便發表。但因此協定之結果,不但日德兩國的貿易額增加,兩國的經濟關係更加其相互之依存性,我國平時及戰時所必要之資材,能得由德國更多量之供給,而使我國生產力之擴充發展增其速度。」

日德貿易協定,既有此種效力,至少可以給一部分的人以一種安堵之念,是不能否定的。茲就昭和十二年度之情形觀之。此處輸出於德國的,日本四千三百萬元,滿洲五千九百萬元,關東州四千七百萬元,日元集團合計一萬萬一千九百萬元。從德國來的輸入,日本一萬萬七千六百萬元,滿洲國一千七百萬元,關東州一千萬元,日元集團合計二萬萬零三百萬元。德國的輸入總數,對於十二年度的日本總輸入額三九萬萬元,僅占五%,即對於扣除了日元集團後的三五萬萬元,所占的比也不甚大。

但是問題並不是單在於金額之大小,而在於日本從德國所輸入是何種物事之點。德國所發表的對日輸出作為重要品的,計有爆發物,彈藥,火柴,汽車,飛機,機械類,精密機械及光學生產品,鐵鋼諸製品,醫藥製品,及種種化學工業製品。

由此可知,在戰時體制下之日本,德國貿易所占的地位,是怎樣的重要。但是因歐洲大戰之勃發,事實上德國已不能再以何種物資來供給日本了,滿洲之經濟基礎為大豆,世所周知,滿洲大豆之輸德國,其數極鉅,而日本以得滿洲之對德權,購入所必要之物資。然大豆之運輸,以英國船為主,故有大豆化為製造品或改由西比利亞鐵道運輸的善後策,就可容易明白因大戰勃發後事態的惡化了。總之關於日本有生命的

緊要的資材之供給路的一條。是被遮了。

日德貿易關係之變化，立即影響於日美通商關係平衡之變化。

四 日美問題的背景與展望

中國問題或廣泛的大陸問題，是日美問題之背景。因為開發廣大的國內市場之故，美國的同亞洲進展，在其他諸國之後。當美國實施保護貿易，而完成了本國的產業之整備，向亞洲進展而開拓新市場之時。諸強國已經設定勢力範圍，而從事於分割榨取中國了。美國直面了此種情形，不能不高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口號，是史的研究所教示我們的。

如此，一九〇三年，美國對於各外國開放滿洲之二重要城市（奉天與安東）對於俄國的獨占滿洲，取採積極的開放政策。……而且美國與因地理關係，而特別關心於滿洲之日本相提携，以對抗俄國，在日俄戰爭中，亦不惜支持日本。但歐戰後，日本在滿洲占了優勢，美國的對滿發展政策，就改向於排除日本的勢力了（引用田中九一條。美國對華經濟政策）。其後相繼而起的日美關係諸問題，以現在的問題為頂點，發生了過去八十五年間日美關係史上最重大之問題。

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日美關係，正如先時格魯大使之演說及其後的交涉中所表示，甚為緊張，但兩者之間沒有可以妥協的路嗎？

日美兩國向中國市場作經濟的進展，均在其他諸國之後，日本經過中日，日俄歐戰之三大戰役，在軍事上及政治上有了大的進展，而經濟的進展，却不能與此相平行。在重工業或基礎產業方面，在昔不如英，近則不如德美，英德今姑置不論。

中國經濟，以蔣介石統一政權之樹立及強化而次第發展，在其發展過程中，依資本主義發展之常軌而進行，成立了中國本身之輕工業與雜工業，而此種工業，不得不與日本的成正面衝突。中國資本主義所求的是重工業的商品，但日本的境遇，不是能充分供給這些的。而此種商品由美德英供給之。是故中日之對立，與中國之依存歐美，可說是此種經濟事變的必然的產物。

中日事變在某種意味上，可以視為日本在維持日本民族之生存，及排除白種人的「掠亞洲之旗幟」之下，要實行如上述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法則而發生的。這是起因為要將從來在歐美資本主義指導之下，由抗日政權所作的中國經濟的建設，改造成以日本為領導的中日經濟的新秩序。而美國對於日本的此種行動的反對者而登場，現在的事態，在日本是死活的問題，而在美國並不如此，這也可以說使問題之解決較為容易，但同時影響於將來之處亦甚大。而且不可忘却，在美國不必作很大的犧牲，就可以採取對日強硬態度，使事情發生效力。在日本利用美國的物資，雖不至為上萬火急的緊要，但在這方面假使是較有利的，則在報償的限度以內，亦應以富於柔軟伸縮性之態度對付之。在美國也有一將來的日美交涉，將以中國之領土完整，主權尊重，及門戶開放為基調，或在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範圍之內，而承認某種限度的歐美列強之權益為目標，只能是這兩者之中取其一者的。——的見解之發表。但在現實的外交交涉中，如上述的二者擇一的形式論理式的呆板，沒有多大價值的吧，故可以視為儘有交涉之餘地。要點，在於關於日本總力的科學的認識，及真的統一確定之國策以對處之。

（完）

日美商約問題

A. Whiting Griswold (Asia Magazine)

歐洲政治之大轉變，以及戰爭之爆發，給予美國與日本解決許多問題之極好機會，蓋此許多問題，皆與美國在太平洋上利益極有關係者也，美國之外交，在東亞有許多一貫之目標，美日關係之歷史上，時時因此而起衝突，其目標為何，可大略言之如次。

一、保障菲律賓羣島薩莫亞及其他在太平洋中或接近太平洋屬地之安全。二、在均等機會之原則上，與中國日本及其他太平洋國家，維持和平的外交及商業關係。三、嚴厲限制東方民族之移殖美國本部及其屬地。四、在太平洋以及大西洋同時維持門羅主義。五、實施美國海濱漁業條例。六、維護美國人民生計財產，無論其住居或游歷於中國，日本，或他國，無論在亞洲，歐洲，非洲，或南北美洲。

美國人中或不能完全同意，以上目標之中以何者為急務，又或不能確定何者較墨西哥油井問題或中立法問題為更重要，但從太平洋關係之立場上觀之，則均認定其為美國外交之基本觀念也。

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六日，美國政府突然宣佈與日本結束一四一五年之條約關係。一八九四年美國放棄在日之領事裁判權時，與日簽訂條約，一九一一年該約重行修訂而成為兩國航海及商業條約，茲經宣告廢止，故該約將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滿期，在該兩約上，以美國之聲明，附有條文，保留任何條約應有施行移民法之權，實則日本簽訂一九一一年條約之時，其引用最惠國原則，以防移民之被排，此條約開明通商航行及留遊歷之權利法律保護以及一國人民在對方法庭受審之種種規定。廢止一九一一年條約之動機，有止一端，實際之外交，蓋均如是，赫爾國務卿宣稱，該條約之款項，應加修改，並加他義。自一九二四年移民律實行之後，紳士協定早屬具文，一九一一年條約中之最惠國一款，係有條件性質者，故與赫爾所提條約綱領中之無條件最惠國原則不同，日本在一九一一年之後，繼續獲得許多新的領土，其中有主權尚屬可

疑者，以致不能引用當時所訂之條文，故在條約本身，已有三種理由，需要修正。至於世界政治之動態，更足供給其他之理由。自中日戰爭發生以來，美國人士早有主張禁運軍火至日之運動，一九三九年春季，美國對華之同情，已表現於官方對華借款，及非正式的禁運軍火至日，同時美政府並無借款與日及禁售軍火與華之表示。美人復有更進一步之要求，禁止軍火之外，並將禁運可為軍事利用之材料，如卡車，汽油，鋼鐵，廢鐵，等物，贊成此舉者，實繁有徒，即平素對遠東事件不甚注意者，羣衆亦將促其贊助，蓋此舉實為反對日本與德意之合作，而欲增長英美在世界均勢之力量，藉以保障和平。一九一一年條約不廢，而美國禁售軍用品與日，則為不榮譽之外交，是以予以廢止，宣佈之後，輿論均稱譽為打破軸心及避免世界戰爭之初步。

但宣布廢約之後，世界政治發生革命，歐戰亦興，廢約之初願未償，而提論亦隨之變形，蘇德協定，蘇日蒙邊停戰協定，及紅軍之侵犯波蘭，有如連鎖之地震，使戰前陣前，完全改觀，而主義開架，亦因以動搖。飛塵稍息，兩事已臻明顯，其一則德日合作，至少現時已經取消，其二，則一九一四年以來，至少在一九三一年以來之遠東均勢，現已恢復原狀。

史太林並未如一般人之推測，而引避歐洲，但即使其波蘭一役足以引起其對波羅的海及巴爾幹半島及近來之野心，其與德協定之訂立，及德國正與英法作戰之不暇，當然增進其在遠東行動之自由，亦即同時減少日本之自由，外蒙停戰協定訂立之後，即有謠傳蘇日擬議簽訂更廣泛協定之說，果爾，則日本將與較前更強之蘇俄折衝，蓋蘇俄已非昔日反共協定所抑揀者，而日本必須有堅強之前線以對付之，修訂訂約，乃為國際關係之良好現象，但需全神貫注以赴之。

史太林將為中日間之調停人乎？抑將以中國作波瀾乎？抑或注目于

沙皇在日俄一役所失之不凍海口乎？希特勒得勢以來，蘇俄從未有如此之自由，又自上次歐戰停止以來，蘇俄從未有如此之強大，足以對以上諸端，動則必有成之成就也。故蘇日無論有任何結合，蘇俄現時似佔上風。

同時英國現時有何計畫乎？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二二年，英日有二十年之同盟關係，其亦將與日重訂條約乎？抑日本將守投機之中立，行望英蘇之間，以等候機關之來臨，而奪取英國在遠東之屬地乎？在此等國際關係未有實形之時，則在遠東之反日運動，或對歐洲有反英之含義，美國對日經濟制裁之實施，或是在暗中創傷友國。

我不應批評廢止一九一一年條約之智，但在現時情形之下，宜有較禁售軍火更廣義的美國政策，易言之，即禁售之外，應有其他補充之辦法。第一，中立法修訂之後，則軍火及戰事材料均可運至英法，日本即欲訂購，亦所餘無幾，即不修改法令，現時美國增強國防，本國需要亦極大，第二，歐戰發生之後，日本與美國之貿易，較前更為重要，在平時日本出口貨物百分之六十四售與美國及不列顛帝國，而進口百分之五十三，亦購自英美，現時英帝國及德法三國之原料，均集中於戰事，則日本原料及重工業之供給於美國者，自必增加倍蓰，作戰國家之進口，既祇限於戰事必需品，而日本自給不足，則其出口之需銷於美國者，亦必較前尤急，此經濟原因之外，蘇俄又恢復其在遠東之勢力，則美國現時對日交涉之地位，自較七月間優裕甚多也。

吾人將如何運用此地位乎？此答案將牽引歷史之事實解釋，目標常較注明政策為易，蓋政策為政府負責人及外交家所決定而為外間所熟知者，而外交上之時間及機會，均需微妙之運用，故即取澈底之民治國，亦必予外交人員以隨機應變之責任。戰時無論矣，即在平時，美國人民，亦無從得悉國際關係之內幕在。歐洲亞洲之新聞記者，無論其如何深入探聽，亦無從而得之，人民所得而知者，即歷史之背景，其重要性即為外交家所保守之消息之根原，而終有事實以證其果也。

太平洋兩岸之美日二強，貿易繁夥，似宜重行修訂商務條約，但

國是否更能解決政治上之岐異乎？四十年來，美日間雖有不斷的政治磨擦，然終為經濟的強力所拉攏，現時兩國對於中國之主權，海軍比律，鮭魚漁業，及移民律，諸問題上，意見均相平，然日本仍為美國之第三位好主顧。美人對中美貿易素極樂觀，而遠東政策亦着眼於中國之貿易，自一九〇〇年以來，中美間國際貿易，不及美日貿易之半數，三十年來，美國與日本在外交上之爭執，並未變易此種趨勢，然則此種經濟力量，其亦將促助當前兩國間之政治困難乎。

美國如現時重與日本商訂與赫爾計畫相符合之無條件最惠國新商約，則美國實受其利外，豈不更能分配及於他國乎？新商約之應否再訂，早在美人研討之中，但有兩種反對之理由。保護派（主張保護美國國貨者）惟恐日本廉價貨品之湧入美國，而美國羣衆，則以日本為德國之與國，為侵略陸線國家，故不應與之訂約，第一種之反對理由，在現時成立之美國與他國所訂商約時，均曾注意及之，其詳細之分析，我人但須仰賴國務院諸專家之規劃，而重訂商約之是否正當，亦為專家之問題，姑置美國市面之景氣與世界和平之大義於不論，美日重訂商約，實際上亦足增進美國之商業，或足為解決目前問題之一助。

美人素懼日本在美國國內及國際市場上之競爭，我人不妨對此等恐懼心之是否有存在意義，加以探討，日本對美國市場之最大威脅，厥為紡織品，但一九三七年美日兩國出產界，已有部分比率協定，故美已不足懼日，一九三〇年以來，美日兩國之貿易差額，常有利於美國，一九三六年，美國佔全世界進口總額百分之十一，出口總額百分之十一，九三六年，日本佔全世界進口總額百分之六，出口總額百分之三，八，日本對南美洲貿易，早已着眼，但一九三八年，日本貨僅佔南美洲進口總額百分之二，六，而美國則佔有美進口總額百分之三六，一，日本以對美貿易差之不利，必須另想方法，以補充其外匯，而抵付美方，其低廉之工資，與夫低生活程度，並不足以補償其資本與原料之不足，美國則匪特資本原料，較其豐富甚多，即技術之熟練，與每人生產率，亦遠非日本可及，則日本固何足懼哉。惟貿易商約，必須附帶部分比率限制，

現有之各商約，均有分配協定，以維護美國國內出產界，使不遭受進口品競爭之危險。

然則日本造成獨裁帝國主義之展望何若？滿洲國與日元聯繫又將如何？大不列顛為世界最老最大最富之帝國，亦尚須依靠美國市場之工業與原料，英國為現時美國最大之主顧，而其自治領加拿大為第二大主顧，日本或以時期之需要，而變易其美國進口貨之種類，與式樣，但其能不復需要美國進口貨乎？美日新商約之訂立，或可使日本放棄獨裁帝國主義之嘗試。

商約亦可有紳縮性，廣則可於出本本國之外，推及於其在亞洲大陸統制區域，即其有駐屯軍，管理幣制，統收關稅各地，狹則亦可僅限於一九三一年以前之日本，同時美國亦可將屬地及潛勢力區包括，或除外，例如美與古巴有特惠商約，與普通之無條約最惠國辦法完全不同，又美國與其屬地間之貿易，有特別保護，如菲律賓，關島，薩摩亞，波多立可，及巴拿馬等處，與美之商約，均有指定免稅之條款，除此之外，美屬地之與他國貿易，完全與美貿易同樣待遇，母國與屬國自由貿易，開放門戶，與他國以同等會。實，現時世界各國所無，祇有無條最惠國待遇條款，乃比較而非十分門戶開放，而值得吾人研究者。此實為在中國唯一之門戶開放，蓋一八九九年約翰海之著名通牒，並未及在華有租界及特權之列強之尊重，在各個之勢力圈中，無不設法排擠商業競爭者，今如日本保證滿洲國及日元集團各地之無條件最惠國，即不啻近於歷史性的中國門戶開放，美國出口商，即不與日本出口商同等待遇，亦必與其他各國商人同樣待遇，即此已屬有利。新商約之範圍，即限於日本本部，滿洲貨物亦可轉運。而商品類名，亦可開列。

至於政治上之收獲，及政治上之反響，似以前者為多，比之日本與英美之經濟關係，他國祇得日本出口之百分之一，三，而售與日本進口百分之四，二，日本加入軸心同盟之後，並未增進德國之貿易，則亦可明政治之不涉於經濟矣，蘇德主義絕不相同，而能以經濟關係，互立不侵條約，日本寧不亦能以經濟關係，與英美通商修好乎？

新商約之訂立，自不能一筆勾銷美日間之不愉快案件，欲美國承認日本之新秩序，或日本取消其計畫，時機均未成熟，在吾人一生中，中國或竟無太平之日，蓋我人一生，為時有限，中國與日本，或正進入新百年戰爭之第二期，而中國驅逐日人至黃河以北，或與法國驅逐英人渡過海峽，同其堅難，英法百年戰爭，雖於一四五三年停止，而兩國間嫌隙仍存直，至一九〇四年小同盟條約訂立，兩國始行和好，然有兩事可確定無疑，日本對中國人民之蹂躪，已打破大亞細亞之神祕，而黃禍之不足為歐美慮，顯而易見，二則對華戰爭得勝之後，日本將以中國戰事資源，對付美國之說，正如德廢皇對前任美總統羅斯福之誇稱而不足信，凡此種種之豫想，或有使中國喘息復元之機緣，美國無政治上之野心，即基本之國策上，亦決不足牽涉於中國之戰爭，中國強盛之後，其對列強之態度，亦不致較日為遜也，反之，美國人民，每對被壓迫者表示同情，東亞戰事不息，美國外交家將不斷播弄此炸藥，現時並有人主張在遠東戰事未結束前，斷絕一切商務關係，但我人國家之利益，既有一定之目標，而政策隨時應變，則何為而不繼續商務戰？美日新商約，如不能針對中國之病症，或亦足造成中日和議之空氣與機會。

此可能性，如付泡影，亦至少有較此稍簡之數問題，可得解決之方，太平洋上諸島之互不侵犯保證，當不致較一九〇八年高平路德協定或一九二四年四強條約為更難，但其價值如何？此種保證，同時如有不設防協定，則雖地域有限，而附有共同觀察條件，似不為無價值者。

此則日本必須讓步於美國，阿拉斯加鮭魚之糾紛，為美日外交上最主要之磨擦，必須獲得根本解決。日本漁船在阿拉斯加各河口捕魚，已引起阿拉斯加與美國西岸之反對，要求政府訂定類似移民律之法令，則日本必將較一九二四時更難應付，尚不如退讓於美，更進而言，日本如聲明對南美無政治野心，必將博美國朝野一致之歡心，日方此等讓步，並非泡沫幻影，但美國將如何接受之，吾人雖不急需和解，然亦非絕對悲觀，商約既於雙方同有價值，自不能以和解視之，而觀夫已往之美國遠東政策，則亦不致包涵其他讓步也。

島嶼不設防協定之成立。可節省國庫之支出，且或爲關島及菲律賓最好之防禦。有如開利賓羣島之在歐洲然，種族平等之承認，在美國固屬一種儀式，而日人必極歡迎之，以爲美國之友情也。

日本移民，如置於分配協定制度上行之，則對日之最惠國待遇要求，方稱公允，蓋此制度實施後，移民額亦不過目前之數，而美日間舊恨，可以消除。此制度實施之後，行將見日本學生，重來負笈於美國各大學，蓋自一九二四年來日學生留美者絕跡，耳濡目染之餘，日本學生或以美國之理想與主義帶歸本國，寧不較外交通牒及折衝更有效乎？

海軍軍縮，吾人未論及之，現時論之，亦屬無能，或反引起爭執，願夫海軍本爲工具，而非鴿的，美國較日本地廣財厚，需用之處極多，自不能接受海軍完全平等之條款，抑尤有進者，吾人固不能忘印日本海

軍居全世界之第三位，太平洋上第二位，除美國外，其他任何海軍，不足以威脅之，中國與蘇俄，或能戰敗日本之陸軍，但中蘇絕無擊沉其海軍之能力，美國有此能力，故必須保持吾人之優勢，但美國不欲在遠東作戰，日本必須明瞭之，商業外交重復條約，足使日本置信。

上述美日修約之大綱，足爲考慮之資，吾人深信有效之政策，必類包括鼓勵與忠告，美國國家利益與榮譽，不受任何損害，且與中立主義相符合，且或可使不安定之遠東，稍爲安定，德人如有如此之機會，不難想像其如何行動，吾人因不必效法柏林，亦不應任機會之錯過，至少亦宜審慎研討之，歐洲既無停戰之望，則遠東之局面，吾人急宜祝禱圖之。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各問題之研究，凡有專著，概所歡迎，譯者不收。短篇文藝作品在八千字以下者，亦所歡迎，創作或譯著皆可。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精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用黑墨清晰繪寫。
- 三、投寄之稿，本報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新世紀 第二卷 第一期

- 四、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爲本刊所有。
- 五、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
- 六、本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七、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書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八、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八二號。新世紀雜誌社收。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

第四章 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

中歐同盟國與蘇聯實行簽訂個別休戰協定後，於是東戰綫的整個問題，便從軍事的範圍，轉移到了國際政治的範圍。協約國保持一種超然的態度，將以後切一的責任，推卸一乾二淨。俄國既然單獨的締結了和約，十二月二十日勞合，喬治在下議院裏說：「當然關於她自己國土的問題，也得她獨自負責。」——這幾句話，作可以拿來代表協約國一般人的態度。

在中歐同盟國方面，情形那便重要得多。她們現在和協約國與俄國議和起來，便必須保證是根據了「不賠款，不割地，和民族自決的原則」的標準——在表面上，這至少和德國議會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採取的「和平決議」的條款相符的。「我們沒有任何征服的野心」，和平決議上那麼說：它也要求一種「互相同意互相和解的和平」；它對一切可能的「領土獲得」，與「一切政府的經濟的與財政的壓迫」都提出抗議。不過在每種這類性質的公文，最重要的當然不是文字，而是真意，而比這兩種更重要的，則是對這二者作如何的解釋。因為誰都可以隨便的解釋一種原則，自從墨索利尼，邁克里斯博士，(Dr. Michaelis)在維也納項和平決議時，用了一依照我的解釋」以後，這種自由權便引起了特殊的注意。

如果要充分認識這種條件的意義，——真的，還有德國在伯萊斯特里把夫斯克和議中的態度，——那就必須了解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以後，德政府情勢的變遷。

(續)

W. Wheeler-Bennett 著 朱深 譯

在那一天，與登堡與魯登道夫被任命為德皇以下，德軍最高的指揮官；而且也就是從那一天起，德國的政治機構發生了變化，起初還不要覺得，後來却十分顯著了。因為這新的最高指揮官，對外交與內政，都要求有種自由控制權。提出這類要求的主動人物老是魯登道夫。元帥和他的副元帥間異常密切的關係，(與登堡自己便說過這種關係，幾等於「幸被結婚的關係。」)已經使這老年人的個性，和那年青人的個性融和無間了。在這奇怪的「心的結合」裏，魯登道夫應該是壯健的，支配的丈夫，而與登堡却是溫和的，順從的，忠實的妻子。在東戰綫，他們的結合，再加上賀弗曼的組織天才，在軍事上證明有極大的效力。自從他們調到西線，又少去了賀弗曼，在軍事上證明他們的結合，雖仍是很見效力，可是等到他們一觸及政治問題，那就變得極端不幸了。因為與登堡根本就應不起政治，他不懂政治，政府簡直使他頭痛。現在由魯登道夫獨自去處理，他真是滿心說不出的喜歡。同時魯登道夫則一味濫用大元帥的名義與地位。

最高統帥部變成了一種「政府內的政府」。(Imperium in Imperio) 魯登道夫獨自和德皇，皇室大臣，外交部長，議會裏各黨各派的領袖，大實業家和職工協會的負責人接洽，事實上他和一切隸屬於德國大本營的人接洽，慢慢的，魯登道夫利用「責任」一個名辭，建立了一種完全的獨裁制度。譬如，魯登道夫不贊成的政策，或是他認為有害於軍事行動的政策付諸辯論時，他便會說最高統帥部對這種行動不能負責，所以懇請辭職，軍需總監便是採用這種「勸誘」的方法，強迫自德皇以下，每個人都對他讓步。有時他的建議得到了與登堡的贊助，他

時常都利用與登堡的名義；他和人家辯論起來，結果老是那麼一套，「大元帥和我情願辭職」。

就是這樣，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最高統帥部破壞了柏特曼、和爾味向俄軍獨和的努力；後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他們不願他的反對，強迫他採用了無限制潛艇政策。到了七月，他們堅持他必須完全脫離政界，而由一個可憐的灰色傢伙，喬治·邁克里斯，前普魯士食糧統制官繼任，而他祇是他們的一個傳聲筒罷了。

政府裏的重要位置，都已由他們的親信佔據，於是與登堡和魯登道夫覺得，現在應該來解決，前時想阻止而沒有阻止得了的，大眾黨向議會提出的一和平決議的事件了。邁克里斯的「依照我的解釋」的危險字句，簡直是代最高統帥部聲明的一種保留，因為決議的字句，和統帥部的征服與割地的夢想，完全是處於尖銳的對立地位的。

可是德議會並沒有了解那位大臣的字句的意義，通過了這項「決議」，最滑稽不過的，他們同時又通過了鉅額的附加的戰債，邁克里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用極正當的自負態度，寫信給德皇：「那項可憎的決議，由二百二十二票比一百二十六票的多數通過了，裏面有十七個選票和兩個廢票。我已經用我的解釋，解除了它最大的危害。在事實上，誰都可以照他所喜歡的締結任何和約，而結果和決議仍沒有衝突的地方」。

真的誰都可以。「陛下，你看」，這位超羣的厄爾士柏率，和已登的邁克斯親王討論這份決議時，向後者解釋，「這樣我用和議的方法，便得到了龍威至布里伊的防線。」(Langwy-Briey Line)「後來甚至確言，「依照最高指揮的解釋，」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與和平決議的條目，是完全符合的。

德國和蘇俄開始議和的時候，德國國內的情形便是這樣。在九月裏，最高統帥部故意破壞了教皇提出的，前途並不是沒有希望的和平。邁克里斯，這一位百日大臣，在十月裏最後的一個禮拜上台了，繼任的是年老的巴威的首相，豐赫耳特令伯爵。(Comit Von Hertling) 如果

這位新的大臣能够年輕一些的話，他對這種軍事勢力，日益侵入政治領域的現象，或許會鬥爭得更堅決一些。現時他的高尚人格和豐富的經驗，雖則使他不能完全接受魯登道夫的意見，可是他老邁的年齡，和勇氣的缺少，要使他反對最高統帥部，力量顯然還是不夠。

大臣庫爾曼便不是這樣。庫爾曼像赫耳特令一樣，是一個巴威人，又是一個天主教徒；四十四歲的年紀，他是德國最機敏的政治家，除掉柏特曼、和爾味以外，可說是戰時德國最開明的政治家。他旅行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事情，他有很深的教養，又是社交界中的一個著名人物，他生在君士坦丁堡，曾在六個國度的首都裏做過隨員與顧問，那是在一九〇五年三月裏一個不能忘却的早晨，那時他給暹羅病弄得顏色蒼白，又被一隊全副武裝的巴威的騎兵所困，他在坦支爾(Tanzwart)沒有築港的旋泊所，攀登上二道曳起的繩梯歡迎德皇，戰事使他負上了重大的責任。他在海牙與君士坦丁堡，都是一個成功的德國大使，他被邁克里斯召還出長外交，後來也由赫耳特令批准了，在這個令人不快的普魯士路德教的沙漠中間，赫耳特令能够找到一個同鄉又是同教的屬員，實在是高興不過的。

庫爾曼並不像許多德國人一樣，他懂得生活的藝術。他能够充分的欣賞名酒，精美的藝術品和美人。他有一種超俗的態度，一種精神上的傲慢，這兩種性格使他變成了一個演劇者，同時又是一個批評者。就是在重大事件裏，他都從沒有完全失去旁觀者，——一個嘲笑的旁觀者的冷淡態度。他嘲笑每一個人，連他自己都在內。他並不淺薄，所以他，連不會了某一事件而深受感動。他永不願像俾斯麥那樣的，將他的名字或名譽，作孤注的一擲。在他看來，那是不價值的。他玩，祇是爲了玩的魔力而已。

不過庫爾曼是又有學問，又具備遠大眼光的。他因爲和當時的事件，發生較密切的接觸，對它們有較深的認識，所以他比幾個高級統帥人物，看得更爲清楚，——那幾個高級統帥人物，全被一羣「應聲蟲」和一種「一相情願」的想法，與事實隔離，庫爾曼就沒有魯登道夫的擴張

備士派的妄想，他，就覺得中歐同盟國，想獲得一種勝利的和平是不可得的。最好是能够希望得到一種雙方精疲力竭的和平，這位新的大臣，自從一九一七年八月就職以來，他所努力的方向，並不是新領土永久獲取，却是注意這總極的目的。他前時想利用教皇和平建議的努力，被最高統帥部的陰謀和邁克里斯的口是心非而破壞了。不過他還沒有絕望。對俄議和的形勢，給了他第二次機會。

(二)

在伯萊斯特、里希夫斯克會議的前夕，再也沒有兩個團體能够像兩個敵對的團體，爲了操縱德國的外交政策，顯出根本上更不相同的性質了。他們中間很深的意見裂痕，使他們在未來的會議裏，失去了成功的一個十分必需的條件——迅速。因爲，在這會議中間，德政府與最高統帥部中間爭持最烈的題目，便是妥善政策的問題。從會議開始到終了，德國的代表，常是給柏林的魯登道夫的陰謀，弄得困惑起來。

他們意見不合的主要原因，是在這將要締結的協議下，對於德奧軍隊業已佔領的土地（包括庫爾蘭（Courland）立陶宛，俄屬波蘭和白俄與烏克蘭人居住的廣大區域）的將來地位。內中以波蘭問題尤爲複雜，使四國同盟兩個主要同盟國，在意見上發生了不少利害的衝突。

交際團雙方均利用復與波蘭的口號，作爲政治宣傳的一種工具。沙皇在一九一四年上便宣佈過，將來波蘭的重新統一，可以在俄羅斯帝國裏，作爲一個自治的單位。一九一六年夏天，德奧會議的時候，結果雙方也同意建立一個獨立的世襲的立憲君主制的波蘭國家。不過這項條款的宣佈，則爲了前參謀總長法爾曼因的代表要求，而擱置了起來；他們忙這個顧者反德，而地位上又處於東線後方重要地位的民族，一旦獲得了自由，結果將不堪設想。自從與魯登道夫和魯登道夫執掌大權以後，這極合理的政策便廢棄了。魯登道夫，滿心希望能够從波蘭人民中間，徵募幾師團的波蘭兵士，歸德軍統轄，所以強逼將德奧同意建立波蘭國的條款，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宣佈。因此雙方那麼小心翼翼培養的，對俄軍獨斷和的接近，便整個的毀壞無遺了。

最高統帥部的政策，是完全沒有結果的。波蘭人接受波蘭獨立的前景完全是那種接受他們應有東西的態度。除非中歐同盟國給予一個真正的波蘭政府，來統轄波蘭的軍隊，否則他們就不願將波蘭的人力，放在德奧同盟國的手裏。魯登道夫的德國軍官指揮波蘭軍隊的夢想，於是又烟消雲散了。波蘭人拒絕接受他的條件。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的「帝國聲明」，祇建立了理論上的波蘭；她並不說明她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被佔區域的管轄權，則仍在華沙與盧布林（Lublin）的總督手裏。一年以後，會議錄裏雖則有三種有力的解決法，可是實情並沒有什麼進步。

第一種，便是所謂「奧國解決辦法」，它主張波蘭委員會與加里西亞（Galicia）合併，再整個的作爲哈布斯堡三帝國之一。哈布斯堡皇帝的人，是擁護這種辦法的，德政府有時也加以贊助，不過匈牙利首相，泰柴（Tisza）則表示反對，他覺得帝國的政體不應有所改變，而且，如果無論如何必須將波蘭加入的話，那最好還是將她造成奧國的一個省份。德國的參謀本部也反對這種方法，因爲這樣一種的解決辦法，在政治上與戰略上，久而久之，都會使德國與奧國締結同盟的效力減弱下去。

關於這個問題，德國方面也擬了兩個解決辦法。第一個，是「奧國解決辦法」的一個針鋒相對的方法，是厄爾士柏革的聰明頭腦想出來的，將俄國與奧國的波蘭全併入德帝國，奧國方面則以兼併羅馬尼亞爲補償。這個辦法，維也納方面加以拒絕了。

第二個「德國解決辦法」，是參謀部長小裏重視的一個，它主張將但澤與托倫（Thorn）中間的狹長地帶放開，作爲東普魯士的一個「保護地帶」，藉此，可以抵抗像一九一四年尼古拉大公施行的一種攻擊。此外再在維斯杜拉東邊，另造一個「保護地帶」，來保護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的煤礦。至於其餘肢體殘缺的波蘭，則德國參謀本部便不大注意；她可以獨立，——不過她必須對德國建立一種有利於後者的經濟關係；或是將她送給奧國都不妨。

可是德奧兩國政府全反對這個辦法。奧國反對的理由，是「經過德意志重慶過後」的波蘭，殘缺得還非舊觀，所以即使和加里西亞合併起來，她永遠都不會有任何適合地位的前途；德政府的所以反對，則是不願意看到帝國內增加大批俄國的人口，參謀本部對這項反對的理由，回答是「在防禦地帶增加波蘭的人口，（那是不能避免的），當然不是所希望的，可是這個反對理由，應該在需要下讓步」。

關於庫爾蘭和立陶宛問題，參謀本部反對放棄任何武力奪佔到的土地。他們的希望，是建立兩個大公爵領地，而這領地必需由德皇本人和普魯士皇帝發生關係。他們將這種意見，由東線總司令作媒介，通知了地方政府，在庫爾蘭，這種選舉會議已在兩個省份內舉行，而米陶（Mitau）的議會，事實上已經請求德皇兼任庫爾蘭大公。

立陶宛人民却沒有那麼溫順，要担保他們服從，必須運用更激烈的方法。伊森堡親王（Isenburg）和豐·夫賴塔格·洛林高文將軍（General Von Freytag-Loringhoyen）毫無禮貌的通知維爾那（Vilna）的議會，要是議會不繼續德意志援助的獨立立陶宛，德國最高統帥部便要堅持爲德國建立一條新的戰略防線，一條由科甫諾經過格羅德諾至得麥斯克的防線，（Kovno-Grodno-Dvinsk Line）這樣將立陶宛分割成爲兩部分，讓東部的立陶宛人民自行設法。

(III)

這就是「依照我的解釋的民族自決的原則」。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克萊那那舉行御前會議；最高軍事長官德皇親自出席。臉色蒼白和神經質的他，埋坐在他的坐椅裏，聽取他的次官與將軍們的爭辯。一方的灰白的頭顱，猶身人面像似的與登堡，在整個的會議裏，完全是漠不關心的樣子；坐在他身邊的，是白髮鬚的大臣，曼赫耳特令伯爵，一個憂鬱的老人，他渴望竭盡他的能力，貢獻一些什麼，可是他又不願和最高統帥發生爭執。到了會議的後半截，他和大元帥都開眼的陷入老年人入睡的狀態，將討論的重任，留給他們的下屬。這正就是他們的屬員所盼望的；魯登道夫，他的土灰色制服的領

章上，閃爍着表示優異的星條，他的小得奇怪的嘴巴，縮在他凸出的下巴與兩頰上。他是瞧不起文官的，他現在正隔着桌子練習的聽着庫爾曼。有些冷淡，有些譏笑意味的庫爾曼，依舊保持了他的演員與旁觀者的雙重人格的態度。

魯登道夫急切地提出了最高統帥部的主張。波蘭問題的「德國解決辦法」，沿着新的邊界建造一條「保護地帶」，這兩點對於德帝國的安全，全是十分必需的。此外，庫爾蘭與立陶宛，必須和德皇本人發生連繫。俄國人必須相信他們的話說，並且應該從愛沙尼亞與里窩尼亞（Livonia）撤退，這樣當地的居民，方可以運用民族自決的權利。這兒雖則沒有明文規定，不過它却暗示着，當地居民應該接受他們的指導，如何才是正當的民族自決。

直到現在，德皇一遇是贊成對波蘭作「奧國式解決」的，不過他老是受最新近的意見的影響，他現在又動搖了，最後贊成了最高統帥部的主張。那應該是一德國式的解決法，「至於這幾個波羅的海省份，如果聯邦的親王同意的話，他願意接受她們，使她們和普魯士國王的名義發生聯繫，或是和德意志帝國連合」。

曼赫耳特令的意見和多數人相同。祇有庫爾曼是獨特異見的。雖是單獨，可並不就滅默下來。因爲他心裏抱了一種更有力的反響意見，所以他一再表示不贊成最高統帥的政策，並且再三論述他本人的信念，就是東部省份的將來，必須給以公正的處置。他作了一點讓步：「我可以將反對在東境設個國家豎立德旗的意見收回，不過我還是要竭力勸告，不要將德旗永遠釘在那兒的旗杆上。」

魯登道夫十分憤激德皇氣餒而不安：「永遠都要這樣的衝突嗎？與登堡醒過來了，庫爾曼問了他一個直接的問題：

「你爲什麼這樣特別需要土地呢？」

從這魁梧奇偉的軀幹裏，發出了深沈宏大的聲音，這位大元帥莊嚴的回答：「在下一大戰爭裏，我要將這許多地方運用我的左翼」。魯登道夫接着說，勝果在將來的戰爭裏，還是要依賴自己的資源的話，那末東

邊的幾個省份，便可以改進德國的食糧，必需時又可以補充德國的兵力。

庫爾曼依舊不心服；德皇則躊躇不決，不願向任何一方表示同意，會議便這樣沒有一個最後的決定而休會了。庫爾曼也就是這樣沒有確切的訓令，跑到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去的。

庫爾曼跑去參加和議時的環境便是這樣。克累那赤的會議，並沒有什麼決定，他可以不受拘束，所以他決定依照他認為最好的方法做去。他確信中歐同盟國所希望的，便是由和議產生的和平；不過他也確信時機還沒有成熟。如果協約國預備接受共產黨的建議，實現全面性的和平時，那就最好；不過庫爾曼深信協約國是不會的。所以，主要問題是引誘俄國來訂立個別的和平。他所以贊同草擬全面和平的建議，便是爲了這叫緣故。祇有這樣建議遭受協約國拒絕以後，才能開啓個別和議的門。等到共產黨人明白，中歐同盟國預備接受全面的和平，而協約國則堅持反對時，共產黨便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祇有揀這個個別議和的一條路了。

這位外交總長便是如此想法。如果全面性的和平會議，接踵而來的話，他預備用庫爾曼和立陶宛來交換協約國萬一在德國西線佔到的土地。要是德國西線的疆界毫無殘缺的話，不管這兩處地方住了許多波羅的海的德人，所以也就潛伏許多危機，他依舊可以將這兩處地方交還俄國。這位外交總長雖希望締結一種個別的和平，他是相信一個時候做一此事的；他現在便專注着手頭的工作，那是一種普通協商的會議。

庫爾曼在出發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以前，他曾和赫耳特令在一起會見了議會裏的各黨領袖。他對他們闡明政府在和議裏所採取的政策，根據七月的和平決議的一種政策，那和蘇聯不割地不賠償的公式完全一致。從左派到中立派，都是一致的熱烈擁護庫爾曼的主張，在這許多黨派裏，有許多黨員是真心願望，和蘇俄訂立一種公平的和平的，他們確切希望會議的結果，會是一沒有一個俄國人，將現在要訂立的和平，看作

是他祖國的一種不幸事件」。

極端愛國主義者的右派，祖國黨，表示一種更正式的擁護。祇要事實是將波羅的海的省份歸併德國，和實現最高統帥部所要求的「保護地帶」，在衛斯泰登 (Wester) 和斯特累則曼 (Stresmann) 看來，那引用的倒底是什麼「驅逐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如果庫爾曼能夠用他的政策，達到這種目的，很好，保守黨和國家自願願意擁護他；不過他們老實警告他，「我們在東邊得到的權利，是化了一筆貴價買的，所以不能隨便爲了幾句不值錢的革命字眼，就輕易的予以拋棄」。這位外交總長就是耳朵裏迴旋着這種「祖先的言語」，出發到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去的。

(四)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五國的代表團，已經雲集在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庫爾曼徑柏林帶了羅生堡來作他的助手，還有一個年青的，薩克森地方的貴族，豐賀斯黑男爵，(Baron Von Hoesch) (他後來會歷任駐英駐法大使，) 做他的秘書長。最討厭的問題是，代表團裏的最高統帥部的代表問題。魯登道夫起初本打算親自到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來，幸虧後來打消了。他和庫爾曼中間的敵對性，會使一切合作的公式，均歸失敗。後來派了賀弗曼，作爲軍方的代表，他有全權的地位，不過祇有勸告權與抗議權。他會充份利用了這兩種權力。賀弗曼雖則一方面是忠實地代表着他的上司的意見，可是他方面也能够瞭解。庫爾曼所對付的是個十分棘手局面。這位外交總長發覺到這種意料不測的援助時，多少有些驚奇起來。

所以魯登道夫仍舊留駐在統帥部的部隊裏，在上邊運籌帷幄，就是在列寧佔了上風的時候，他還是預備來個不及掩耳的迅雷。這個會議變成那偉人鬥智的場所，其餘的代表祇其棋盤上的小兵小卒而已。起初魯登道夫將列寧送回國去，本來也把他看作其一個被搬弄的小卒；可是現在他們却隔着歐洲，面對面的鉤心鬥角了。

庫爾曼抵達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時候，已經有許多代表在等他，賽寧，西施舍烈克斯將軍，(Crischerics)和豐恩斯涅男爵，(Baron Von Wiesner)他後來會以被逐的哈布斯堡皇室代表的名義，在歐洲許多地方活動失敗。布加利亞和土耳其代表團的主要人物，波僕夫(M Popoff)和納西美培，(Nesimiy Bay)後來首相。賴陀斯拉服夫(M Raciolavov)和土國總理大臣塔拉脫。E)沙(Talaat Pas-ha)又加入進來。

蘇俄的代表團，仍舊由越飛率領，除掉新加入那個革命的「史官」坡克洛甫斯基，(Pokrovsky)和薩麻羅(Samoljo)將軍，作爲像阿脫樂志一樣的技术顧問外，其餘的代表，就和上次休戰協定時一樣。

最奇怪的是在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代表們，後來大半都遭遇到不幸的死亡。庫爾曼在納粹的德國裏還是活着，不過多少是朝不保夕的。賀斯黑和普羅，在中年的早期便夭折了，他本是在一種他們嫌惡與鄙棄的政體裏繼續服務的，因爲他們憂慮在辭職後，不曉得是那一種人物來替代他們，可是他們生的意志，到底給這政體嫌惡與鄙棄所逐漸毀壞了。塔拉脫，巴沙，死在一個亞美尼亞的刺客之手，他是爲許多被屠殺的被害者復仇的，而賴陀斯拉服夫則戴上了手銬脚柙，被牽了在索斐亞大街上游行示衆。

在共產黨人裏面，這「命運更加普遍」。托洛斯基，那時他雖則沒在這場所出現，却是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他現在在墨西哥過着一種懷着深恨的隱居生活。他失敗的時候，連帶拖累了許多人。一千五百以上的蘇聯公民，以托派罪名而遭「清算」了，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會議裏的幾個最著名的人物，便都在裏面，越飛，加門納夫，蘇科羅尼科夫和加拉罕，本都是大使等級的人物，後來都公然侮辱的，將他們從高處上拖了下來。越飛是自殺的，加門納夫與加拉罕，則以托洛斯基的「法西斯」助手爲詞，將他們槍斃。蘇科羅尼科夫和賴特克，蘇聯最有才幹的政治發言人，都爲了同樣的罪名，禁閉在牢獄裏。蘇俄的兩個專家，阿

爾脫樂志海軍上將與薩麻羅將軍，都在一九一八年的「赤色恐怖」裏，在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堡的小屋裏，一起住了將近四百人，在公衆膳廳吃飯，過着一種節儉的生活。德國人將汽車給俄國共產黨隨意使用，(那兒也沒有多大地方可走，)至少在表面上。是充滿了一種友愛的空氣。他們特別體貼那許多俄國的海陸軍專家，充分明白他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對他們表示的很深的同情。

十二月二十號晚上，東線的總司令，大元帥與登堡，魯登道夫，賀弗曼和巴威的利歐威爾得親王，設筵招待到會的代表，赴宴的代表幾乎有一百人。可說是近代外交史上稀有的盛會。那兒的氣象，充滿了對比性質，桌子的位置上，坐的是有鬚子的，壯健的巴威親王，他右邊是越飛，剛才從西伯利亞牢獄裏放出來的一個猶太人，再過去是賽寧伯爵，一個「諸候」和舊式的外交家，「金羊毛」的一個武士，是在美特涅(Meternich)和考尼茲(Kaunitz)的傳統學說與訓練出來的，越飛會用了柔和眼光與和藹的語調對他說過：「我希望我們也可以在貴國裏煽動「革命」。

依照「革命禮儀」的規定，委任的地方的地位，高出於專家的地位；所以那個水手，奧列支，坐在正席上，而德軍上將阿爾脫樂志，反坐在招待室裏吃飯。這種辦法是的確苛刻的，賀弗曼的對面，是工人代表奧勃可夫，他正爲了菜碟旁的許多刀叉，而老大爲難成，他先試用一樣餐具夾菜，然後再試用另一種餐具。「祇有叉，他運用靈活得像一枝牙籤似的。」不過老斯達契詞夫，那個農民，才是真正的展覽品。他現在已經絲毫都沒有什麼不慣了，他正在充分的使他自己享受。他將來回到村上去，他要告訴他們怎樣一種奇遇啊，哈哈！他滿心快樂的大笑，搖着他的灰色長頭髮，將菜餚一盤一盤的挑進他的連腮鬍子的大嘴裏去。他特別賞識好酒，他從來沒有拒絕，當他一臉正色的，問他的驢廩恩恩斯特·豐·和恩羅尼親王：(Prince Ernest Von Hohenlohe)「那是一種酒強烈些？紅的還是白的？」我喝什麼酒，都全沒有關係，我祇是愛它那一股勁兒」，這位滿冷霜的德國人，都不禁馬上浮上微笑了。

等到筵席吃完，斯達契訶夫，他的天性本來就不是灰色的，現在抬高了他的滿臉紅光的，忠厚的臉孔，真可以說的一個「紅色」代表了。

桌子的另一端是雷·庫爾曼男爵，賀弗曼將軍，與加門納夫及蘇科爾尼科夫；蘇科爾尼科夫正在對他們熱烈地談着，他們預備使俄國的無產階級走下極端快樂與繁榮的當前工作。這幾個人的對面，便是厄涅斯特豐和恩羅厄親王，坐在他隔座的，便是比桑哥夫人，一個沉默的，矮小的，灰色頭髮的鬼手。

雙方的和議代表，不單是在餐桌上表示出顯異的對照。在會議席上，這種不同點就更加顯著。歷史的幻想，決意使這破天荒最革命的政府的代表，要和一切統治階級中最反動的軍閥代表，坐在一張會議桌子上。最講究紀律和顯然最確實的政府的發言人，偏要和一個搖動的革命政府的領袖聚在一起。

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一個團體，在思想上發生像他們那麼大的差異了。中歐同盟國談着外交上久被尊崇的，傳統的，前輩的用語。他們想的是戰略線的條件，割地的條件，和獲得的經濟利益條件，共產黨可就不是這樣。他們的並不是疆界與熱土的一種談判。這是共產主義與西方的第一次接觸，蘇聯代表的目的，是利用這許多會議，作為他們主義宣傳的傳聲器。依照他們的歐洲全面和平的原則，他們並不注意地理上的名詞和用語。他們全力專注在對歐戰的民衆宣傳，所獲得的直接效果，就是獲得他們曉得不能倚靠他們的武力所獲得的東西，換句話說，那就是世界革命，和以「無產階級專政」替代帝國主義。

「我們所以開始和議的緣故，」托洛斯基寫，「是想激起德國，奧

匈和協約國工人團體的希望。爲了這個理由，我們不得不將會議時間，儘可能的拖延下去，這樣可以給歐洲的工人，有充分時間來了解蘇聯革命事實，特別是她的和平政策。」

此外，要充明白共產黨和平建議的真意，必須由共產黨哲學的看法。一眼相去，蘇俄和平計劃裏的，答應將民族自決給予國家主義的一點，彷彿會削弱了共產黨的勢力，因爲這樣一來，帝俄的許多土地，無可避免的不是宣告獨立，就要尋求中歐同盟國的保護了。不過照當時共產黨人的想法，（後來逐漸的改變了，）不管那個敵人，資本的帝國主義者，能够獲得更多的土地與資源，他們以爲是無關重要的。他們並不在那種戰場上戰鬥。他們的戰場，是階級鬥爭的戰場，所以將前線和無產階級與資本家的戰鬥比較起來，是沒有什麼重要性的。「立陶宛是否割讓給德國，他們就不大注意。重要的是立陶宛的無產階級，和立陶宛的資本家的鬥爭。」

「他算不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列寧在一封給美國工人的公開信裏寫。「如果他不懂得要戰勝小資產階級，或許要先失去土地和遭受敗仗。如果他不能犧牲他的祖國，來採取社會革命的勝利，他便不能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在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共產黨人的心理便是這樣，他們確實的希望，可以用這種政策，改變世界。等到這種政策失敗以後，共產主義裏的某種基本原素便失去了，後來還是用「妥協」來填補了這個缺憾。使今日蘇聯呈現分崩離析現象的，便是爲了尋求這個「某種基本原素」的緣故。

（第四章第四節完，全書未完）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面 四 分 之 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	九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 注 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新世紀 第二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新世紀雜誌社

督 印 人 唐 士 林

承 印 者 上海安達印刷所

出 版 期 半月刊 每逢一號及十六號 出版

定 價 國幣 一元 港幣 五角 仙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
C字五八九號

